



21

徒囚

著方十張

行印社版出館立

徒 囚

每冊實價三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張

十

方

發行人

湯

灝

發行者

立

體

出

版

社

桂林東華路廿號

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經售者

各

大

書

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出版

「達達……」，金盛利貞這個狡猾的傢伙，在用指頭敲着那扇鐵皮門上裝着的小木窗。

金盛利貞，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頭髮梳得雪亮，穿了一件黑紗和服，做出來的奸笑會像劍一般刺着人的感官。他是一名兇惡狡猾的「刑事」（註一）。

鐵皮門被關得鐵緊，門的橫額嵌着一盞明亮的電燈，下面是一塊橫的小木牌。藉着電燈的光芒，「留置場」（註二）三個黑字，便非常明晰地投入我的眼裏。

神經有點昏迷糊塗，不知是爲了懼怕或是憤怒。腦的機構失去了運用思考的本能，我似乎

（註一）便衣警察。

（註二）拘留所。

已將一切交給命運之神了。

帶着沙沙的推擠聲，鐵皮門上的小木窗閃到側邊，空出一個穹窿，而這個空白，立刻給一個滿臉橫肉有着鼠一般的眼睛和一小塊仁丹鬍子的面孔堵塞住了。鼠一般的眼睛望一望金盛，再望一望我，然後嘖哩咕嚕地低聲與金盛交談起來不久，「察察」地，鐵皮門有一半被推到側邊，留出了一條足容一個人的軀體進去的空隙。金盛那傢伙沒有進去，閃在一旁。這樣，我便與那條空隙恰恰打一個照面。地獄在向我伸開兩手，我明白我得投入它的懷抱中。依照我那時不大清晰的記憶，好像並沒有由於他們的叱喝，我就不自覺地跨了進去。接着，鐵皮門重復被推上，把金盛最後所說的「支那人」這幾個字的尾巴，關進甬道中。

一條窄長的甬道，像是要向無涯的黑暗的原野展開去。兩旁隔着適當的距離，有着好幾扇上半截裝着鐵柵欄的門，像一匹匹的巨獸，張開的血盤大口，在等待食料。

甬道的中段，靠在門與門之間的一片牆壁旁，放着一張方桌子；牆壁上還架着一排小木櫥，一盞白亮的電燈，吊掛在方桌的上面，把這一大段甬道，照耀得頗為清楚。桌旁坐着一位穿白色警察制服的看守，而剛才開門的那個同樣服裝的看守，這時也站到桌旁。我是站在桌角，至於我

怎麼會站到那裏的呢？也不大記得清了。總之，每一位進來的犯人，他一定會很自然地跑到那裏。我心裏有點混亂，然而，又像並不怎麼怕。怕什麼呢？隨它去。

坐着的看守用不很清晰的聲調向我發問，像一匹蠢而狠的動物的低聲怒哼。他的這種說話的方式，使我不了解他發出來的聲音中所具有的意義，但也許一半是因爲我對日本話的聽覺不十分到家。然而，他的姿勢與乎桌子上的物品，使我了解他的慾求。他右手拿住一枝毛筆，眼睛望住我的嘴巴，桌上有一本翻開的簿子，一面是空白的，還有一面寫着一個人的姓名、年齡、職業住處……這是多麼的明顯呀，他還不是要將我的姓名籍貫也寫在簿上？於是我便開始試着用不大流利的日本話說出我的國籍，國籍之後是姓名。說到姓名，他再也沒有辦法聽得懂了，他注意聽我說出來的，我的姓名的音波，可是他的手停住動作，他沒有辦法將我說出來的聲音變爲紙上的黑字。這樣下去，究竟不是辦法。於是我用手作手勢表示叫他將筆給我自己寫他同意了，這一步手續就很快地完結。

這之後，站着的看守開始動手。他叫我把和服的黑紗束腰帶解下來，把衣服脫下來，只留着一條短褲。他察看了一遍，再令我將和服穿好，可是束腰帶却被留下了。木屐也被留下。這樣，除了

一件白紗的和服與乎一雙短褲外，我真變得一身外別無長物。

我心裏到那時却像頗有點坦然。他們要怎樣將我處置呢？總之，我是踏入地獄中，我漸漸與死神接近了。這時，我簡直變得無所懼怕，也許可以說神經已不知理會到懼怕。

站着的看守從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串鑰匙，跑近靠在桌子左邊的鐵柵門，開了鎖，將門推開了半邊，指着要我進去。我默然地跨進去，於是我接觸到一幅地獄的景色。

是一間長方形的小房，長約一丈半，寬約七尺，高却有兩丈多。頂上是白中帶黃的天花板，安在正中的一盞光度不强亦不甚弱的電燈，靜穆地在散發出淺黃的光彩。藉着它的淡黃的光彩，可以看得出室內的全部情形：左右兩旁是兩堵發出灰黑色的水門汀牆壁，一直向上伸延，與頂上的天花板密接起來，沒有留得半點空隙。後面一堵同樣的水門汀牆的上部，擺得有一面兩方尺寬的窗。窗面除了橫貫着一根根粗大的鐵條外，還張上一層鐵絲網，使得窗的作用無法充分發揮。地下鋪着一層地板，地板上攤着幾張破爛的草蓆，上面並排地一共睡了四個人。雖然時間已是九月初，可是東京九月初的天氣仍然悶熱得可怕。因此，這四個人都將一條灰黑色的破氈子，埋在身邊僅餘的空隙上。他們睡熟了，而且睡得像頗為安靜。他們並排地躺着，恰恰將整個監

腐爛得滿滿，我再也沒有辦法打橫地躺得下我的軀體。

然而，他們大概身體並不怎麼長。他們躺着，把頭靠近右邊的牆壁，於是在左邊，在他們的腳與牆壁之間，便留出一長條空隙來。過度的疲乏使我將就地坐下，終於躺下了。

一陣陣難聞的惡臭，從四面八方向我的鼻孔進攻，我無法辨別而也無法形容這是一種怎樣的惡臭。它不單刺戟我的鼻孔，它甚且刺透我的內心：它該是汗臭，人體臭，炭酸氣，用過十年的草蓆破氈所發出來的臭味的總和吧。一陣噁心，我幾乎要吐出來。終於，我努力地忍下去，頭有點發暈。

不久，躺在靠近鐵柵門邊的囚犯醒了，他爬起來，爬到左邊牆壁的角落裏，將一個橢圓形的鐵器的破鐵蓋揭開，將身體挪近一點，在小便。接着，一種劇烈的刺鼻的新臭味，在房內更利害地飄盪巡行。

藉着燈光，我可以更清楚一點辨別出這個囚犯的顏面：長長的黑壓壓的鬍鬚，蓋滿了雙頰，佈滿在嘴邊；頭髮是約莫有兩個月沒有剪修過，年紀大概四十歲光景。一雙一看就使人得到一種狡滑的印象的斜眼，生在瘦削的面孔上，特別觸目。看到我是那麼的侷促屈躺在他們的腳底

下，於患難中，人類的同情心使他叫醒了。躺臥在裏邊的兩個青年人，勉強地給我讓出幾寸地方，納得下一個人的軀體那麼寬的空隙。我於是改爲躺在兩邊砌着人肉的空隙中，屈着我的手臂，枕住後腦。這樣我總算從人的腳掌所發出的特有的臭氣內被超度出來，可是人體的潮熱感，一種無法形容的惡臭，仍然籠罩住我的全身。離我的脚下不遠，就放着那個小使用的鐵器。

炎暑的天氣再加上人體所發出來的溫度，使號子裏好像火爐，我的汗急速度在滴流，將我的薄紗和服都滲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奇怪我的腦神經不單沒有迷糊過去，相反的，它好像更加興奮，更加清明。

後腦枕在屈曲的左臂上，眼睛望住天花板正中的電燈，過去的一切，變成回憶在我的腦幕上映演出來：起先亡故的慈母，辛苦勞力在工作着的哥哥，一直就在希望見到我的芳妹以及一切的親屬友人的面影；接着是過去的生活，艱難困苦的童年，黃金時代的中學生生活，賣文爲生的流浪生涯，終於從美麗的故都流浪到國外的孤島上。我爲什麼會跑到這裏來呢？不是自投羅網？我又爲什麼不早些歸去？難道我終將死在敵國的「帝都」的地獄中？難道我就永遠不能夠再見到我那美麗崇高的祖國……

我踏進地獄之門，是在下午十一點左右。躺下了，紛亂的思潮使我一直就無法合眼。鐵柵門外甬道中看守的辦公桌旁掛着一個小掛鐘，我聽着它清脆地從一點敲到四點。正當我由於過度的胡思亂想，因而使腦神經有點脹痛，不由得昏昏入睡的當兒，一片「起……」的吶喝聲混雜着同號子難友的急凍爬起的動作，將我喚醒，我本能地隨着他們站起來，這時鐵柵門外的小掛鐘，清脆地敲了五下。

難友們紛紛將破舊發臭的毛氈疊起，再將破碎的草蓆一張張捲好靠在牆壁上放着。這時，看守將鐵門開了，祇由一位囚犯把疊好的破氈抱出去，放到正對住廁所的貯物室裏。當他再回到號子來時，鐵門便再度關上。

接着，甬道中出現兩位頭髮密而長的犯人，手裏挽着一個盛水的鉛桶，在鐵柵門外往來走動。鐵門下部一扇五方寸左右的小門開了，從小門被拋進幾塊濕淋淋的抹布。號子裏的犯人，各人都拾起一張抹布，用力地揩擦地板和水門汀的牆壁，我也照樣在學着做。揩抹完畢，抹布從小門遞出去，小門便又重被關上。

不久，鐵柵門開了，號子裏五個人便魚貫出去，其中一個手裏捧着小便用的那個橢圓形的

鐵器。

在號子內，大家都赤足，連襪也不許着。號子門口散亂地放着好幾雙木屐草屐，它們於樣式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當穿着的時候，你需用大腳指縫叉住屐前的布帶。它們是供全個留獄場的囚犯們公用的，因為每次放囚犯到外面洗臉或大小便，都以一個號子為單位，於是這幾雙木屐，便輪流地從第一號監房放到第六號監房的門口。

洗臉的所在是甬道盡頭左邊一個不滿一方丈的小房間，其中包含着廁所的設備。惡臭瀰漫在房內，刺戟得我的感官頗感難受。五個人一踏進去，已將整個小房間塞得滿滿了。他們用最迅速的動作大小便，洗臉，但大小便和洗臉的地方，其闊度僅足以容納一個人。於是其餘的人，祇好站着等待。我在等待着小便；及至輪到我洗臉的時候，已是最末後的一個。我正在用那塊小得可憐的汗手帕，胡亂地揩拭着面孔，一聲兇惡的喝罵，已經從門口突破了充滿惡臭的空氣衝到我的耳中。我趕忙抬起頭來，眼睛突睜得圓鼓鼓的，看守的一副兇狠的面孔，使我陸地駭了一跳。定神一看，洗臉室內祇剩着我一個了。再也沒有餘暇給我躊躇，我轉過身來，用迅速的步伐，跨回號子裏。看守的叱罵，跟在後面。當我一隻腳跨進號子的門階，鐵柵門已經迫着我另一隻還沒有

縮進去的腳發出一聲巨大的音響闖上了。我的小腿着了一下沉重的碰擊，號子裏有兩三副嘲笑的眼光望我一眼。

掛鐘敲了七下，留置場的大鐵門發出「卡隆」的音響，開閉了一次。號子裏一個三十歲上下的難友低聲地自言自語說：「吃飯啦。」

鐵柵門下部的那扇小門（似乎說小洞還來得恰當）被從外面張開了，一名別個號子的難友的面孔出現在柵欄外，他用眼光向號子裏探看一週，在點算着人的數目。於是，五雙竹篾從小洞口伸進來，接着是五盒「辨當」（註一），還有五個小木碗盛着半碗「味噌」湯，這就是我們每人一份的早餐。「辨當」一半盛着米飯，份量約等於一滿碗，空着的一邊，放了幾片鹹蘿蔔。味噌湯泛出淡黃色，裏面除了滲和一點醬滓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什麼。

（註一）用木盒盛着供一個人吃的飯肴

這時，人們都聚集在門旁，跪坐在地板上，像久已粒米不進的叫化子在等待着難得的施捨。一般「辨當」一到他們的手中，迅速的動作便告開始。我仍然平坐在地板上，拿起我應得的一盒來，正想試着嘗味一下，旁邊一位難友立刻警告我，他低聲說，吃飯的時候應當跪坐着，不然，就會受到看守的叱罵。爲什麼呢？然而我知道，地獄中是不會存在「理由」的。一個失去自由的人，更談不到「理由」。

我用竹筷挾了一團飯送入口中，粗澀的滋味使我沒有辦法咽下去。終於，我將木盒放下，我從跪坐的姿勢改爲盤坐。旁邊那位三十多歲的難友在低聲勸我：

「那不成呀，不吃，你會瘦弱下去的。」他說，用手在臉上比一比。

「我實在吃不下去。」

「吃不下也得勉強吃一點呀。」

可是我終於沒有聽他的勸告，剩下來的「辨當」就由他和一位四十多歲的難友分吃了。早飯吃好，號子裏的人都隔着相等的距離盤膝端坐，本來他們是四名，大概每人坐的處所是由於習慣而固定了左邊靠門口的角落就是那位三十多歲的肥壯漢子靠裏牆的角落是一

個穿蹺脚西裝二十多歲的瘦個子，右邊靠門的角落是一位四十多歲鬚髮滿頰的，而靠裏牆角落則坐着一個肥頭胖耳十六七歲的少年。我爲了與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於是祇好在右面靠牆的中央，盤坐下來。

一個整晚的失眠，使我的眼睛疲乏到了極頂。悶坐着，很自然地會打盹，眼睛閉上，頭像波浪洶湧中的小艇，搖呀搖的。猛地裏一聲霹靂般的叱喝聲，衝入我的耳膜，我被驚醒了，睜開眼來，一副兇惡得要吃人的野獸般的臉孔出現在鐵門的柵欄外，一對突出來的眼睛正在向我射過來。一道會使人打寒噤的眼光。叱喝的罵聲還從嘴裏噴出。坐近左邊角落裏的那位難友，替我向看守求情。他說我是新來的，不懂裏面的規矩。等到看守悻悻地踱開，他才低聲向我說，監房裏的規則，整個白天犯人祇許盤膝端坐在地板上，不准站起，不准躺下，甚且不准將腿伸直，不准坐着打盹。乘機，他更在好奇地向我探問我被捕的原因。

從踏進地獄直到這時，我一直就像一個啞巴，沒有發過一點聲息。我心裏在想，戰爭也許會使兩國的人民變爲仇敵。平日飽受軍閥麻醉的他們，一旦知道我是中國人，會不會對我有什麼不利呢？或者至少會不會對我有什麼隔膜或敵視呢？我不能說話，我的聲音會使他們知道我是

異國人。

然而，那三十多歲的人毫不放鬆他的追問。外表上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個好管閑事而又頗為爽快親切的人。見我不回答，他再一次提出他的問題。他的動作引起同號子每一雙帶着好奇的神色澤的眼光集中到我的身上；而且坐在我右手那邊角落的那個胖頭肥臉的少年人，也向我的身旁挪近了一點，低聲而又天真地告訴我，假如我說話的聲音低一點，看守是不會聽到的。他說，假如我懼怕說話時聲音會給看守聽到，那麼，我儘可以用指頭在地板上寫着回答他們的問話。

這却使我有點爲難了。我想，終久是沒法瞞住他們的，於是我祇好用指頭在地板上劃：「我是中國留學生。」再劃：「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被捕進來。」

這一劃，却更增加他們的好奇。驚訝的表情爬上他們的顏面，但完全沒有仇視和憎恨。

接着是一大串的問題：到日本有多久？住在那裏？在什麼學校讀書？爲什麼被捕進來？家裏還有什麼人？想念家鄉不……

我約略將問題回答過後，那位三十多歲的粗壯漢子向我分別地介紹同號子的人。他自己

的名字是松本正雄，三十五歲，被捕的原因是偷竊，關進去已經四十三天；胖少年叫澀井三郎，十七歲，洗衣店學徒，被捕原因也是偷竊，關進去已經二十六天；坐在右邊靠門角落那滿臉鬍鬚的叫村田武夫，四十三歲，被捕的原因也是偷竊，關進去的時候最長，已經有五十八天了；還有那個穿整脚西裝的瘦個子青年人，叫倉田進，二十八歲，野雞汽車司機，被捕的原因是酒醉鬥毆，關了三天，因為罪狀最輕，很快就放出去。

末後，松本向我補充地加以解釋，他說他和村田都經過一個長期間的失業，家裏還有妻和子女，生活迫得他們去那麼做。至於澀井，他說，是因為好吃，偷了東西換了錢，都填到貪饞的嘴裏。

三

當天上午九點左右，倉田被釋放了。帶着歡欣的表情，這個瘦削的青年人向同號子的難友們略微打一個臨別的招呼，便隨着看守跨出地獄之門。即使是兩三天失去自由的人，也會以最興奮欣忭的心情去迎接「自由」的。又即使是「自由」剛剛被剝奪了的人，別人之重獲自由，

也會使他感到最大的羨慕。

像死囚的期待特赦一般，「自由」的慾望開始在我的胸中燃燒。我在焦急地期待着。我想，也許自己會立即被釋放的，用不到經過何種方式的審問，因為我實在是無緣無故被捕進來。我想，也許在一向自命爲「文明」國家的「帝都」中，大約不致於毫無緣故地將一個異國的青年學生拘禁起來的吧。

期待在我的胸中煎熬，像一條蛇嚙咬我的心靈。

九點半左右，看守長與警長一般的二四個傢伙，進留置場來作一次點名。點名時是叫着犯人的號碼，到這時，我才知道自己是「十番」(註一)。當叫到我的時候，我還得被喚到號子的門口受一次檢查。以後我才知道，舉凡初進來的犯人，除了初進場時得受看守的嚴密檢查外，第一次點名時，還得受一次檢驗。

十點左右，放出號子去小便一次，時間被限制得非常之短。

那麼，且看你們這班狗東西究竟要將我怎樣處置？迫害死一個毫無罪狀的青年人，也算是

「帝國」的光榮吧？我坐在地板上這麼想。

快到十一點，留置場鐵門外的一聲「張」，將我從焦急的期待與幻想中喚醒。我知道是叫我，於是應用剛剛一兩個犯人被喚出去時的動作，站起來高聲應了一聲「哈衣」（註二）。號子的鐵柵門開了，我出到甬道中，看守指着掛在門外左側的木板上一塊寫着「一〇」的小黑牌，叫我將它反轉來掛上，好像小學校裏請假的名牌被掛一個反面一般。

不，跨出留置場的大鐵門，一副奸狡陰毒的臉孔，在迎接我，它向我發出一絲像野獸捕獵到食料時的得意的奸笑。這一絲奸笑，會使人的毛髮悚然。真使人不敢相信，這麼一副老奸巨滑的臉孔，竟然屬於一個三十歲不滿的青年小伙子。他就是金盛利貞昨天親手從「下宿館」（註三）拘我進地獄的刑事。

他用手拍一拍我的肩膀，又是一聲做作出來的奸笑，眼裏放射出一瞥陰毒兇狠的光焰，使我不期然打一個寒慄。

（註二）是一種答應呼喚所習用的聲音，意約等於「有」字。

（註三）公寓般的寄宿舍。

他指着靠近留置場左側的樓梯叫我上去，這時我還能夠說什麼呢？我沉默着，我帶有殉道者般的心情，鎮靜地一步一步跨上去，他跟在後面。樓梯盡處是一條狹長的走道，向右延展，走道兩旁並排着好些房間，房門橫楣都釘着一塊牌子，我沒有仔細看清牌子上的字。依照他的指示，我一直向前跑。走道盡頭位置了一間比較寬闊的房子，門口釘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特別高等室」五個端整的黑字。左邊是一間敞開着門的小房間，門的橫楣同樣釘有木牌，上面寫着「第二調室」。金盛指着叫我進去，他也跟進去，隨手將門關上，我心裏不禁陡地一驚。

房間的大小和留置場的號子差不多，正中擺着一張長方桌，旁邊散亂地放着幾張破舊的小圓檯。除此之外，左邊門背後放着一張舊的木衣架，上面掛了幾套「劍道」（註四）用的衣服及竹劍。靠裏邊，臨街開一扇閤窗，人們的眼光通過它可以看得到蔚藍的青天，天上飄盪着幾縷自由自在的初秋的白色雲；更可以看得見屹立，在對面的建築物，裏面人們在「自由」地生活工作……

金盛那傢伙指着桌子右旁的圓檯，哼了一聲。我祇好坐下，他自己則坐在桌子左邊。他從衣

袋裏掏出一卷白紙和一根鉛筆，將白紙攤平放在桌面，右手緊握住鉛筆於是眼光死盯住我的臉部，表情立刻變得兇惡萬分，真有點殺氣騰騰，活像一匹要吃人的惡獸，吼叫與叱喝混和着的聲音，從野獸的喉管吐出來：

『姓名是？』

我說了，他記在紙上。

『年歲？』

我又說了，他同樣記在紙上。

接着是籍貫學歷，到東京的時期，從何處來，家庭的狀況，到東京的目的……等等。

我以簡單的語句回答，日本話的程度使我沒有辦法說得更詳細。

『你的日本話說得很流利吧？』他換了一個題目。

『不，我祇能夠略微說一點。』

陸地用手在桌上出力一拍，眼睛鼓得圓溜溜，像快要突出來一般：『不呀？一定的，馬鹿野郎』

(註五)』

我牢記住鎮靜的態度往往會使無理的威脅毫無效果，於是我慢慢回答：

「實在不大會講，你去問一問御婆樣（註六）就可以知道了。」

「御婆樣說你講得很好，馬鹿。」又是一聲粗暴的喝罵。

我明白他這句話是毫無根據，我沉默了，這時，也許沉默是我的最適當的武器。

他用那雙鼓得圓溜溜的眼睛，向我睜視片刻終於，也許他感到厭煩，憤然地站起來，嘴裏不住咕嚕咕嚕，揮着手叫我跟他出去。下了木扶梯，我的軀體便又埋葬在地獄的黑暗的死寂裏。

（註五）罵人的話，像「混帳王八蛋」

（註六）房東太太的習稱。

四

午餐的「辨當」並不比早上的好多少，祇於同量的米飯及鹹蘿蔔外加了幾片不大新鮮

的菜葉及一小方塊豆腐，可是味噌湯被取消了，代以小半碗白開水。即使是這樣，爲了過度的飢餓，我竟然將全「辨當」的份量吃去一半。

由於不習慣盤坐，我的腿發着難忍的麻木；又由於一個整晚沒有睡眠，疲乏不絕支配住我的神經與肉體。這是一種怎麼樣的生活呢？

以前友人向我講述的我國留學生無端被捕後所遭受的毒刑拷打的情況，這時化爲一幅一幅活生生的景象，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看到彷彿自己正輾轉於惡毒的鞭笞之下，可是這時無寧說我的憤怒多於懼怕。最多也不過一死，我深切理解到同胞們會踏着我的血爲我復仇的。復仇的火把不是早已高高舉起了嗎？

不過我也幻想着，或許我很快就可以被釋放出去：今天或者明天。因爲我自己實在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毫無罪狀。

這時，號子裏祇有四個人了。在四方的小房中，每人盤坐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靠鐵柵門右邊角落的村田老，是背靠住灰暗的水門汀牆，微閉雙目在打盹。躲在他那個角落，假如看守不注意，是不容易瞧到的。左邊角落的松本，是一個好動的傢伙，眼睛不住向四面溜望。當他的眼光

碰到我的眼光，常常接着是一個會心的帶着安慰意味的微笑。胖少年澀井，就坐在我對過的角落，不時乘看守不注意，用手指在牆上劃寫一些字句給我看。可是因為他用了過份多的「片假名」(註一)，不容易全部為我所了解。

我呢？我的思潮在不停地波動漲落。

約莫在兩點半，留置場鐵門外又響起一聲「張」。當我跨出到留置場門外，我發見叫我的已經不是金盛，却換了一個矮而胖的典型的日本浪人式的人物：圓圓的頭頂，中間禿髮的頭皮，閃亮的發着油光；三角形的面孔，也是光油油的；眼睛發射出兇惡的光芒，像一匹獵狗；肚皮圓得有點突起來，個子又是那麼矮短，一看就使人生出一種不愉快的反感。

他看到我，沒有做出冷笑，刻板的臉孔甚且沒有一絲表情，祇是用獵狗般銳利的目光，迅速地向我渾身掃射一遍。於是揮動着手，指一指我上午所曾經跨上過一次的樓梯，示意叫我去，他跟在我的後面。這樣，一前一後，我被指點着一直跑進樓上的走道盡頭的特別高等室中。這時，室內已經坐有四五個人，金盛也是其中之一，都穿着襯衫，打着領帶，外套被脫下來掛在牆壁

的衣架上。那時雖然是九月初，東京也有「秋老虎」的

看情形，他們的「公事」似乎頗爲忙碌。室的中央是一排形式簡單的寫字檯，幾張並列在一起，形成一個長而大的長方桌，桌面堆滿文具和簿子表格，兩邊都坐着人，埋頭在書寫些什麼。我和矮個子的加入室內的空間，並沒有使他們的工作停息一下。此外，室內左方還擺有兩張擺設得較爲講究的寫字檯，一張正有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頭伏案書寫，另一張還空着。靠右邊牆壁，連接是一排櫃子，放滿各式各樣的簿子，表格，紙張……左邊，臨街開了好幾扇窗，而且還有一個小門，通達一個小陽台。這樣，使室內的光綫頗爲充足。

矮個子自己坐到右邊擺設最講究的寫字檯正中的旋椅上，桌旁一張小圓櫈，被指定作爲我的坐位。當我坐下去的時候，我乘機用眼光向寫字檯的表面，偷掃一遍，我發見在檯的右角，貼着一條細長白厚紙，上面寫着「主任千田平吉。」我知道這個矮胖東西，大概就是千田。

其時，我心裏反而變得無所畏懼了。我自知自己實在無罪，審問之於我，其實沒有什麼意義，除了從審問中更清楚地證明我是沒有罪的人。而且這樣的環境，也不適宜於毒刑拷打，我的心變得安靜。雖然一晚未曾合眼，人就未免有點倦乏，可是腦神經是清晰的，還沒有失去自己的鎮

定。

畢竟是「主任」另有作風，開始他並不問什麼話，從抽屜裏掏出一張拘留人犯調查表，擲在我的面前，伸過一枝鋼筆來，當然是要我填寫了。表中主要項目約有：

1. 姓名、別字、年齡、籍貫、學歷、經歷。
2. 被檢舉的日期。
3. 家庭的一般狀況及經濟狀況。
4. 入學時經濟來源。
5. 曾否應徵入伍。
6. 所有朋友的姓名住址。
7. 思想的進行過程。
8. 信仰什麼教或什麼主義最崇拜的是誰？
9. 讀過一些什麼書對那種科學感到興趣？
10. 是否愛好運動、音樂有無什麼嗜好？

此外，還有一些記不清的小項目，其中有好些簡直使我不知應當如何下筆。然而，我總算盡了我的能力，把它們填得不至於露出什麼把柄。例如朋友是盡可能地把數目填得最少，把孔老夫子放在最崇拜的人上面，感到興趣的科學是經濟學和文學，除了愛好音樂之外還好酒……

填好遞過去，倭個子千回大略看一遍，冷笑一聲也不說什麼話，隨手抓到一張白紙，在上面亂劃了一陣，伸到我的面前，用粗暴的語調叫：

「寫出來！」

白紙上是一個題目：「詳細寫述你家庭狀況及經濟情況。」

我寫了，用日文寫，結論是我的家庭乃小有產者，哥哥在中學裏當教員，每月我可以從家庭方面收到一百元上下的經濟供給。

倭個子看了，又是一聲毫無表示的冷笑，像一副機器裏發出來的刻板的音響。接着，白紙上又是一個題目：「詳細寫述你和中國朋友及日本朋友的關係。」

我在東京的朋友，大半是以前國內的同學或同學的同學，至於還有幾個日籍友人，則都是關係極淺，祇曾經用世界語通信，有些甚至從未謀面的。這些友人，我於填表時不能不略為寫

上幾個，因為我知道我的寫着友人姓名住址的小冊子，一定會落到這些傢伙的手裏。可是我却没有想到，那本小冊子和好些書籍、稿件、信件，實早已給他們搜劫在手中了。

我約略將我和一些朋友的關係寫好，千田看過後，已經不是照例的冷笑，而代替以一句粗暴的同時又是辛辣的問話：

「喂，你著作了不少的原稿呀？」

聽到這句話，我明白了，我明白在下宿館我抽屜內的那幾篇從日文雜誌翻譯出來打算寄回國內各雜誌換一點稿費的文稿，已經落到他們手裏。於是，我更知道我的臥室，已遭受他們的搜劫了。還有什麼話說呢？我點一點頭，回答一聲「是的。」然後再用不大熟練的日本話加一個補充的解釋：「是幾篇從日文雜誌上翻譯成中文的稿子。」

「你翻譯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麼？」惡狠狠的問。

「寄到國內的雜誌上發表，換一點稿費。」

「寄給什麼雜誌？把它們的名稱及所在地寫下來！」跟着聲音，飛過來一張紙和一枝鋼筆。約略寫了幾個經濟性質的刊物名稱，看過後，倭個子突着眼睛問：

「那麼，你該認識它們的編輯者？」

「並不認得。」我鎮靜地回答。

「那他們怎麼會用你的文章呢？」

「祇要文章好，適合他們的雜誌的需要，無須乎與編輯者認識，稿件也會被採用，而且我是常常給那些雜誌寄稿的呀。」我不知道這樣的說明有沒有效用。

「每月可以翻譯多少字？」

「沒有一定，空閒時譯一點，大約每個月總是兩三篇吧。」

「那麼每月從這方面有多少收入？」

「也沒有一定，平均總是三十元左右。」

也許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再發掘下去的必要，千田像蝸牛般蠕動肥胖的肢體，使旋椅發出吱吱的低泣。他微轉過身軀，打開置在右邊桌上的一隻腫漲的皮包，從裏面抽出一大捆東西來。我恍如遇見了一位久別的知交，感到無限的親切。平日使用慣的或則曾經塗上一點心血在上面的許些東西，已被從下宿館我的住房中遷移到本富士警察署的特別高等室內了。可是同時，

我心裏也略微一跳，我知道有不少在我認為是毫無不妥的東西，也許會成爲一種橫加罪名的「證據」。

首先，倭個子把那捆東西解散開來，從其中檢出兩本世界語的書，擲在我面前厲聲問：「這是什麼書說出來？」

「兩本小說，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還有一本是尤利巴基的犧牲者。」
「啊，犧牲……犧牲！」倭個子帶着得意的容色。

於是他再從堆中抽出一束信件來指着向我發問：「這是什麼人的來信？」
「大部份是國內朋友寄來的信。」

「裏面說些什麼？」

「也不過是平常問候的話吧了。」

他作聲抽出幾封信的信箋，攤開看了一下，爲他所不認識的中國字使他感到多大興趣，於是他重復將它們放下，將問題轉到另一個方向：

「常常到車驛去調查日本兵出征的狀況吧？」

這個問題問得多麼突兀與可笑呀！慣於作間諜的日本人，也難怪會把任何一個居留在東京的異國人看成一個間諜。我這時却不能不擺出嚴肅的表情來回答這個卑鄙的探問：「絕對沒有，我一直就沒有踏入過車站一步，這點『御婆樣』可以給我證明。」

「唔，真的嗎？」又是一個冷笑。

「真的。」

「你今天所說的話都是真話嗎？」

「沒有半句謊話。」我的態度斷然而肯定。

「那麼……」蘿蔔一般肥矮的身軀從旋椅裏慢慢升起，揮着手叫我站起來，於是我又一

次被送回黑暗的地獄裏。

盤坐在地板上，我的頭腦回復於清明。想起剛才所回答所寫述的一切，其中并無半點足作犯罪的證據，足可為拘禁一個人底藉口的。既然毫無罪狀，一個自誇為「文明」的「法治」國家，大概不至於無理地將一個毫無罪狀的人拘禁在監獄中的吧？於是「自由」又在我眼前放射出引誘的光彩，我相信我會被釋放的，很快就被釋放出去的。

這實在難以想像，人類期待自由的心情，比期待和久別的情人的會晤還要焦急萬分。而去自由的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刺痛，也非過來人所能想像於萬一的。

已經是取調（註一）後的第三天，也就是踏進地獄中的第四天了，好像雞蛋般大小的石塊落入汪洋，一切仍是渺無訊息。前面像一條延展於無涯的沙漠中的小徑，不知究竟通到什麼荒蕪的原野。

人變得焦燥，憂愁，悶急。時間是馱了過重的東西的老牛，蠕行於迢遠的旅途上。一天好像一年，一點鐘好像一個月，是那麼難於捱受的歲月呀！

每天，刻板的生活使人寂寥無味得比死還難受。早上五點鐘，在看守的吡喝聲中爬起來，晚上八點鐘，又在看守的吡喝聲裏躺在硬地板的破蓆上。整個白天，祇能盤膝端坐，一個瞌睡或者

一個輕微的動作落入看守的眼中，便會成爲換來毒罵的資料。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喫三盒淡澀無味的「辨當」，初時不能下咽的東西，由於飢餓的逼迫，也喫得慣了。除去每天起身後及睡覺前，還有上午十點與下午兩點左右，一天四次放到號子外大小便，其餘的時候，即使大小便急得要滾出來，你也祇好咬緊牙根盤坐在地板上硬忍。這是「人」的生活嗎？誰也難於想像在自誇爲「文明」的國家的「帝都」中，有些人在過着那種豬狗不如的生活。而且天氣還是那麼的酷熱。晚上躺在惡臭的氣氛裏，在臭蟲蚊子的攻擊下，實在不容易合一合眼。

一天早晨，喫過早餐的「辨當」不久，一片羣衆合唱的悲悽的歌聲，從臨街的小方窗飄進號子裏來。唱的是日本國歌，可是聲音不單不見得雄壯，而且着實包含有點悲哀的音調。歌聲終止，接着是三聲高呼。這種聲音告訴我一個可喜的消息，那就是我國對侵略者的抗戰是日趨開展了。原來從「七七」以後，瘋狂的徵調在鄉軍人的暴風，是瀰漫於整個東京的街頭。每當「送出征」時，悲悽的國歌聲就會從滿載在大卡車上的出征者的親屬朋友的口中合唱出來。這種合唱聲傳入死寂的地獄裏，特別顯出一種悲哀的成份。

神聖的抗戰是在日漸展開，而我這副沸騰着熱血的軀體，却不放在祖國的戰場上，而竟然

囚禁在敵人的地獄中，遙想祖國的漫天烽火，我不禁神魂於祖國的大地了。

焦急的期待煎熬著我的內心。既然審問過，既然沒有找到我犯罪的證據，他們以什麼理由將我拘押住？一天，兩天，三天……希望是多麼的渺茫，難道我就沒有活着出去的可能嗎？

一連下了兩天雨，號子內顯得更加陰森，潮濕，寂靜，悲慘。而氣溫也像破了洞的輕氣球，驟然地往下沈落。白天盤坐固然會感到一點涼冰冰，晚上蓋條破氈，竟寒冷得整晚沒有辦法入睡。這種下去怎麼辦呢？我想，即幸而不死於刑，我也定會死於病的。

而這時我唯一的希望却是於死寂的生活中來一點變換或則一點新鮮的刺戟，不管是好的或壞的，祇要是一點小小的變動，靜寂死板會使人的心情墮入絕望的深淵。

一直到九月十三日——還不算長的地獄生涯，尚沒有使我忘記時日的次序——在上午十點鐘左右，我又一次被金盛的一聲「張」引出了留置場。當時我的心情像待決的死囚，我想這該是我的判決之期吧。出了留置場，我仍然被那個狡猾的刑事金盛領進樓上的第二調室。調室的方桌旁，已經坐有兩個着西裝的金盛向他們點一點頭，將我向他們交代一聲，便轉身出去，還順手把門掩上。

坐在方桌旁的兩個傢伙，一個約莫三十三四歲，戴一副近視眼鏡，還有一個年紀總在二十七、八兩個都是瘦個子，瘦臉皮。一樣有着一種並不怎麼兇狠的表情飄浮在面上。他們擺一擺手，示意叫我坐下，年紀較輕的一個，開始用中國話向我說話了。雖然說得有點生硬，可是勉強還可以聽得明白：

「我們是警視廳（註二）派來的，爲了調查你這案件。你先將你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說給我吧。」

我用中國話分別說了，他用日本話翻譯給戴眼鏡的聽。他聽了，隨手用鉛筆記在平舖桌面的白紙上。這時，桌面還堆着千田從我的住房搜來的東西。

接着又用生硬的中國話發問，再問的是從什麼地方到日本，什麼時候抵東京，到東京的目的，在中國時的學歷被拘捕的經過情形，翻譯稿件的作用，認識的朋友的數目及關係……等等。這些問題，我早已在十天前回答過千田。我真不明白千田竟然沒有向他們說過一聲嗎？他們爲什麼又來重覆問這些差不多的問題呢？可是這兩個傢伙的態度實在並不怎麼兇惡，甚且可以

（註二）警視廳是東京警政最高機關。

說頗爲和善。我仍照十天以前回答千田一般用中國話向年紀輕輕的千田回答一遍，再由他翻譯成日本話，說給戴眼鏡的寫在紙上。這之後，那個翻譯員再用中國話告訴我，他說我的事情不要緊，很快我就可以釋放，叫我放心。這一番話，又將希望的胚芽植入我的心田內。

他們好像對這種審問並不感到興趣，甚且互相說要趕快將問話結束。於是在十二點鐘之前，他們便完結他們的問與寫的工作。

「還沒有吃飯吧？」翻譯員用中國話問，態度略微有點客氣。

「我是在留置場中吃「辨當」的。」

「唔，那「辨當」不大成，這頓還是在這裏給你叫一點東西來吃吧。你身邊有沒有錢？」

「我幾十塊錢都放在下宿館裏，大概已經給金盛他們搜來了吧？」

於是，他到特別高等室去。不久，一個飯館夥計模樣的人跟了他進來，手裏拿着一盒「天

井

（註三）

我簡直有生以來從沒有嚐過那麼甘美的東西。十天的淡澀「辨當」使我的味覺官能生

（註三）一種飯上放着魚蝦的日本飯。

出一種不平常的食慾，我將整個碗中的飯，吃得不剩下一粒。

回到留置場號子裏，澀井問我吃過飯沒有。當我告訴他我吃了一碗「天井」的時候，這個饑嘴的孩子，竟然羨慕得什麼也似的，眼睛放射出飢餓的光，口角的唾涎幾乎要滴下來。唉，可憐的孩子，什麼人使你在過度的工作之後仍然沒有辦法滿足你的嘴巴呢？

六

躺在硬冷的地板上，想起白天受審問的情形，我簡直像得到一點慰安。既然是警視廳派來的人，說話當然是負責的。瘦個子翻譯員不是說我的事情不要緊，很快就可以被釋放的嗎？照這樣看來，我大概頗有釋放的可能吧。於是我更幻想出去之後，我應當立刻回國；回國之後，我應當去做點自己所應當做的事。胡思亂想像一匹不羈的野馬奔馳於空闊的大自然的懷抱中一般，對不起，我變得有點興奮，興奮使我的眼皮沒有辦法闔上來。

第二天，是九月十四了。天剛發白的時候，照例在看守的叱喝聲中驚醒，又照例雜在難友中

擦過地板，吃過無味的冷「辨當。」之後，作什麼呢？依然是盤膝坐在地板上，依然是一個渺茫的希望，在靄面若隱若現。今天，也許今天就會放出去吧？自己對自己這麼問。

九點多鐘，鐵門外一個熟練的聲音：「張。」

每次我聽到這個熟識的聲音，火便在我的內心作着極度的燃燒。同時，眼前立刻出現了一副奸詐陰狠的面孔。帝國主義者的鷹犬，不知多少善良無辜的青年傷喪在他的爪之下。祇是這一次，我略微感到這一聲「張」恍惚給我帶來一點希望，也許是爲了釋放才叫我出去的吧？

我想。

我應了一聲「哈衣」，站起來，看守把鐵房門開了，再把留置場甬道盡頭的鐵門開了。外面站着金盛那傢伙，臉上是偽善的微笑，這微笑再配合着那雙狠毒的眼光，會使人從心底冷起來。

他又領着我踏上木樓梯，再將我領進「第二調室。」室中雖也坐着兩個着西裝的，可是却並非昨天那兩個。金盛照例將我向他們交代一聲，就獨自退了出去，仍是順手將門關上。這一關，我不其然地意識到有點不妙。然而我不怕。一想到整個民族正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個人的

讓我來描畫一下這兩個傢伙吧。這兩個東西給我的印象，要比昨天那兩個壞上一萬倍。他們在我的腦中生出憎恨來。其中一個是四十歲上下的矮個子，胖得連肚皮都突了出來，這種模型，已經夠使人惡心了，再加上那一臉橫肉，那一雙鋒銳的眼光，叫人會想像到一匹已經吃得飽飽而每時仍在毫不放鬆地捕獵食物的野獸。還有一個年紀三十歲左右，高個子，臉孔的表情死板到好似一個木像，戴一副近視眼鏡，會說中國話，大概也是翻譯員。他們分坐在那張長形方桌的兩邊。當我踏進去的時候，矮個子用銳利的眼光刺我一眼。跟着，他惡狠狠地站起來，嘴裏發出聽不清楚的叱罵，又是幾道眼光，然後他從衣袋中拿出了一紙「警視廳」的證章，直伸到我的鼻尖上，又是幾聲野獸的吼叫。

我被指着坐在一張空着的圓檯上，就在那匹矮獸的旁邊。審問開始了，先由那個翻譯員用中國話問我的姓名、籍貫、到東京的時候、目的、家庭的經濟情況、在東京的朋友關係……等等，順次地用鉛筆寫在紙上。然後，他再翻着與昨天同樣堆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堆從我寓所中搜去的東西——這該是警察署提供給他們作爲一種證據的吧——同時就開始了他的探索。

「唔，你有着不少的日本朋友呀？」他翻開我那本記寫着朋友住址的小冊子，這樣問，聲音

裏沒有半點韻節，是生硬刻板的。

「那都是世界語的通信朋友。」我說。

「怎麼與他們通起信來的與他們通信有什麼目的？」

「各國的世界語者一般地有這種事情，世界語者徵求通信的地址在全世界任何一個世界語刊物中都有。至於我與他們通信的目的，祇是爲了交換風景明信片及舊郵票。」我這樣給他解釋，而這也是實在的情形。

「還有呢？」

「還有，那便是爲了好奇心與趣味？」

「哼，」這個字是從鼻孔中出來的：「不會這麼簡單。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有沒有參加？」

「有。」我祇好這樣回答，原來於這其中，還有一段痛心的事情。中華留日世界語者學會的負責人鄧克強與黃一寰兩人被捕底記憶，還是那麼清新地留在我的腦中。那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了，晚飯後看報紙，「朝日新聞」的夕刊帶給我一個永難磨滅的悲傷，它用小小的一方塊，記載着鄧君於當天上午二時在睡意正濃中被逮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日本有名世界語者中垣

君過了兩天，在麴町區碰到周大白，他告訴我黃一寰也被捕了，他們硬被戴上一頂紅帽子，據說鄧君還遭受到毒打呢。這麼一來，世界語學會的會員名單及一切文件，都落到他們手裏。

「不過我參加進去祇有三個多月。」我補充地說。

「參與過多少次該會的座談會？」

「四五次吧。」

「會中討論過一些什麼抗日的事情都說出來！」聲調變得更兇惡。

「絕對沒有。那祇是一個文化團體，爲了聯絡感情，爲了研究世界語，所以我加入。」這原是學會底真正宗旨，我們是以合法手續組織的。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刻毒，凡可以戕害我國青年的機會，那裏肯輕易放過？他們硬說它是一個宣傳抗日的組織。用心惡辣，真非置我們於死地不可。

「哼，沒有瞞得過我？一切我們都知道的。」

他再詳細地審問我讀世界語的經過，與日本世界語者發生關係的經過。不時將審問所得，用日本話告訴那矮個子。最後，惡狠狠的語句直衝到我的面部來：

「你知道嗎？一個世界語者一定有一種思想，一種解放弱小民族的思想。」他將「解放弱小民族」幾個字，出力地寫在紙上。

我有什麼話說呢？我既然是一個世界語者，他根據這個邏輯，肯定我也具有這種思想。具有這種思想的不就是帝國主義者的敵人嗎？這該是我的第一個「大罪」了吧。

於那個翻譯員用中國話的探問中，聽不懂中國話的矮胖子祇能不時地間接得到一點報告。一匹慣於吃人的野獸，那裏甘心作一個默然的旁觀者？他似乎覺得非施展一點威風不可了。首先，他用手在桌上那堆東西中亂翻一頓，接着，用手指在地址簿上，野獸般的吼叫聲響起來：

「王志清是你的朋友嗎？」
我點點頭。

矮胖子像獵得了什麼食料般，野性更銳尖地發揮出來，口中不停息地叱罵，同時，在紙上用力地寫了幾個大字：「×××幹部。」

「王志清是×××的幹部，你一定知道。」翻譯員的話。

那，真是天曉得我與王君的認識還不過一個多月。至於他之爲藍爲紅，我的腦中簡直連想

像都沒有想像過。

我搖頭，我說我實在不知道。

矮胖子看見我搖頭兇惡的火焰將他的臉頰燒紅了。他怒氣沖沖地罵着「馬鹿野郎」突然站起來，衝出室去。室內，翻譯員沒有說話，祇用得意的眼色瞞我一眼。死寂的沉靜，統治住室內的空間。我心裏陡地一跳，我意識到矮個子會帶回來更兇殘的東西對付我的。然而，在那時，我絲毫不感到懼怕。我將以戰場上的勇士一般的精神，挺起胸脯來接受一切。

一瞬間，矮個子回來了，右手握着一根兩尺來長的粗黑的橡皮鞭，滿臉殺氣。我的預料沒有錯，我要咬緊牙根承受敵人的鞭笞。

他坐下，嘴裏大聲叱喝：「知道嗎？」

我仍然搖着頭我還沒有將要說的「不知道」三個字說出口，我的大腿上忽地受了重重的幾鞭。我沒有感到疼痛，我祇感到難以言說的憤激。這幾鞭，是銳利地刺入我的心底，我終生不會忘記這個恥辱。我將要用鮮血來洗清這個恥辱。我的血在沸騰，火在燃燒。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付我國的留學生，是用馬戲團的教師對付野獸般的手段。

「不知道中國的留學生都是這樣，起初什麼都不知道，等我們動手之後，什麼都知道了。」翻譯員冷冷地說。唉，真不知有多少同胞，是這麼屈打成招的？

橡皮鞭停止了落下，倭個子的鉛筆又開始在紙上亂塗。一面塗，一面口裏說着與所塗寫的具有同樣意義的話：「王志清有沒有叫你加入×××？」

我還來不及搖頭，橡皮鞭已跟着幾聲連續的「馬鹿野郎」之後，像雨點一般落到我的背上，臂膀上，大腿上。我咬緊牙根，我竭力忍受。我決定，即使死，我也不在這樣問話之後點一點頭。

那匹野獸也許因長久的鞭撻而感到手的疲乏，於是又暫時停下來了。跟着是這麼的一句，眼珠睜得突出來：

「王志清有沒有叫你調查日本軍隊動員的情形？」

「沒有。連日本話也講得不太好，我怎麼能……」我正要繼續着說下去的話，已給橡皮鞭的動作擋回去。

帝國主義的鷹犬呀，你盡量發揮你的獸性吧！我要復仇，我一定要復仇，總有那麼的一天。

我忍住悲痛，我的頭有點發脹，神經有點恍惚。這時，那匹倭獸感到手的疲乏了，鞭答停止下

「我沒有犯罪，我與王君祇是普通的友人。然而，假如你們一定說我和他有着密切的關係，好的，隨便你們怎麼樣。你們說一個字，我寫一個字，算是我的招供。」我用中國話向翻譯員說，他一言不發，刻板的面孔上沒有絲毫的表情。

這時，矮個子忙於翻桌上那一堆從我寓所搜到的東西，像一匹獵犬在找尋新的飼料。忽地，一些新的食料落入他的眼中。他從堆中檢出那幾篇從日文雜誌翻譯出來的稿件，用左手緊捏着，伸到我的鼻尖下：

「這是什麼？馬鹿野郎。」

沒有我回答的餘暇，我的背部，腿部承受了一陣沉重的橡皮鞭。

「你將日本的國情寫出來向中國報告呀？」翻譯員這麼說。

「不。這些稿件，都是從日文雜誌中翻譯下來的，原文俱在，不信可以去查看。」我這麼力爭。

「你譯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麼？」

「爲了拿稿費。」我直截了當地回答。

「一個月中可以翻譯多少篇？可以拿到多少稿費？」

「那就沒有一定了。」

其時，矮個子已顯得有點不耐煩，將桌上的東西放入一隻大皮包內，然後他跑出去，把金盛叫進來，於是我又被金盛帶到樓下的地獄中去。

晚上，背部、臂膀、大腿都在隱隱作痛。躺在硬冷的地板上，一轉身，被鞭笞過的處所一碰到地板，一個較為劇烈的疼痛，便會散播到全身。我整夜失眠，我想起過去的一切，更想到「死。」我沒有流淚，睜大眼睛望着高高地綴在天花板中的那盞昏黃的電燈。

第二天，臂膀與背部的創痛減輕了一點，可是大腿上的創痕却比昨天要更痛一點。揭開衣服來看，紫紅色的斑紋佈滿在大腿上，肌肉有點發熱。想起一位同學曾經告訴我，以前東京有些我國的留學生無緣無故被捕之後往往會受到有毒的橡皮鞭拷打，兩三個月之後毒發作了，肌肉便會潰爛起來。我的大腿是否也會爛在這種毒鞭之下呢？

一切陷於絕望之中，前途渺茫，遼遠，黑暗……我像在期待着，但期待的究竟是一些什麼呢？
真連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

十四日的審問，橡皮鞭的答痕，不單給我的心葉印上永難磨滅的恥辱，而同時它在我的心情上，更像沉重的鐵鎚一般撞上一擊。我明白了，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鷹犬們是不會輕易放過對一個我國的無辜的青年學生底虐待的。於是，死的陰影又漸漸在我的心頭生長起來。難道我終於死在敵國的牢獄之中？

這時，心裏却萌生着一些出奇的想頭，我覺得自己像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個冒險家，爲了探求人生的奇跡，於是我從我的家鄉到福建，從福建到上海，到北平終於我是冒險到這個野蠻遠過於十五世紀以前的小島來。冒險家所必然碰到的命運，除了奇跡的生還以外，便是險難中的

死亡假如我能夠生還該是一個奇跡。不然那也是一個冒險家所應有的命運，於是我差不多變得非常之坦然。當然，這種意識的萌芽也許是由於我否定了自己的價值。我覺得自己於人類，於民族，於國，於家，似乎是沒有什麼用的了。那麼，即使無聲無息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於敵人的地獄中，又算得什麼呢？

那時，對自己的死雖好像並不可惜，然而，不能夠再一見愛我而又為我所愛的朋友，却覺得是一件頗堪遺憾的事情。於是後悔的心情又像一朵烏黑的雲塊，飄上我的心頭。我為什麼不早些歸國呢？我為什麼要等家裏那幾十塊錢呢？難道我生命的代價就只有這麼一些？

然而，後悔照例是無濟於事的呀。

於是，這樣的幻想又爬上我的腦中：我幻想着我被釋放了，跑在「自由」的空氣下面，我首先到本鄉理髮所去剪一剪過長得不成樣子的頭髮，然後到春日町大國食堂去飽餐一頓。十幾天的無味的冷「辨當」已經使我的食慾強烈地燃燒着我的內心。從前曾經喫過的即使並不是怎麼好的東西的滋味，竟然成爲一種想像得非常地真切的回憶活躍在我的腦海中。能夠隨着自己的心意痛快的大喫一頓，那該是人生一件最快樂的事吧！

幻想很快就給現實粉碎了，我仍然被囚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帝都」的地獄裏，四周充滿了黑暗，前途渺茫得近於絕望，究竟什麼東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呢？

我凝望住對面的死灰色的水門汀牆壁出神；這時，正是喫過晚餐的「辨當」不久，天在下着雨，滴答的雨點聲隱約傳入耳朵。在昏黃的電燈光下，號子內陰森得怕人。也許悶人的秋雨使兇惡的看守也變得懶怠了吧。來回巡邏的皮靴聲以及獸吼一般的吡喝聲，已不大從甬道經過鐵門的柵欄傳入號子裏來了。而於這種寥寂的情景中，從希望到絕望的幻想，一定使我的面部的表情於不自覺之中變得憂鬱，悽愴。這點，大約已經給坐在右面角落裏的松本正雄看見了。他輕輕用手指在水門汀牆上彈兩下，發出低微的兩聲「的達」，已將我的思潮打斷。我本能地抬起頭來，望過去，他在向我招手，低聲叫我向他那邊坐近一步，同時他用手向鐵柵門外一指，然後再將手掌搖了兩搖。

在我們坐近得細聲交談可以聽得非常清爽的時候，他低聲問我是不是想起家裏來。

我搖一搖頭，我說：「並不，祇是心情覺得頗為愁煩罷了。」

「用不到愁煩呀！沒有一點罪，你一定會被釋出去的。」他向我安慰。

「唉，」我低微嘆了一口氣：「這種生活，過下去會使人發瘋的，你也思起家嗎？」

「想是想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其實，出去也還是挨餓呀！」

「你的妻和孩子們一定常常想念你，當你進來後，他們怎麼樣生活呢？」我帶着同情的口

氣問。

「我的妹妹在醫院裏當看護，他會給他們生活上一點幫助的。」聲調裏有些憂鬱的成份。

「你能夠快點出去就好了。」我希望這句話可以給這個天真誠樸的壯年人以一點點安

慰。

那知他反而變得更憂悽了，在一下搖頭之後，他說：「出去又有什麼用呢？大概沒有希望找

得到工作的，我已經失業好幾年了。」他將手掌直伸到我的面前給我看，藉着淡黃的燈光，我仔

細注視那隻粗大的手掌一遍，可是我在它上面發見不到絲毫異樣。疑惑的態度使松本知道我

不了解他的意思，於是他向我解釋，他說他的中指與無名指的指根沒有硬皮疤，正是長久沒有

做較爲粗重的工作底一個最好的明證。這時，我才發見到他的手掌雖然頗爲闊大，可是表皮却

並不粗糙，掌面的確找不出半小點硬皮，它甚且比我這隻長年執筆，爲了自己洗衣服而弄上兩

三點小硬皮疤的手還要來得斯文。他也拿起我的手掌來，看見中指與無名指的指根下長着的硬皮，於是他問我是否在學校裏作體育運動時弄出來的。我祇好點一點頭。松本是一個親切而又真樸的人，他好動，頗天真而帶有一點滑稽幽默。方闊的臉面，粗大的眉眼，厚的額，闊的嘴巴，是一個老實誠懇的典型。全號子甚至全留置場的難友和他的感情都很好。在號子裏，當大家給死寂的環境磨折得有點受不住的時候，他會忽然地做一個鬼臉，或則低聲哼一支日本的俚曲，甚且有時會乘看守不注意站起來裝模作樣地作一陣奇形怪狀的舞蹈，引得全號子的難友都抿住嘴暗笑起來。

這時我的號子裏又加進一個新難友，名字叫做池山正治，二十七、八歲左右，瘦個子，近視眼，留着長頭髮，穿着日本型的西裝，頗像是一派斯文的人。他向我說，他是日本橋某株式會社（註一）的職員，被捕的原因是「配佈（註二）左傾刊物」。而且他還向我說，他的會社中「左傾」份子很不少，有一次曾籌集了一萬多塊錢捐給日本的共產黨組織方面呢。可是後來不久，我才

（註一）股份公司。

（註二）傳遞與分散之意。

知道他這些話是一片胡言，完全是說謊。松本告訴我，池山被捕的原因是爲了虧空「會社」兩千多塊錢，虧空的原因則主要還是嫖。而且事實也部份地如是證實了，原來「思想犯」的鞠審，照例是在樓上的特高室，而且照例是由金盛到留置場提人。可是池山每次都由樓下的警務科出去，在樓下的審問室鞠審。

他的向我說謊，是否含有某種惡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不過這個傢伙實在有點滑頭奸狡，後來我和他同在一个號子裏的時候最久，漸漸我變得非常之討厭他了。每當一個新難友進來，池山便會用一種奉承的詔態，指手劃脚地和新囚犯談論我，我祇好裝做不理會；有時，他會向我這樣說：「你永遠不會出去的了。」說過後，是一個得意的奸笑。

那時同號子裏的難友，一總是五個：松本、池山、我之外，還有老少兩個「泥棒」。澀井和村田，澀井是一個誠實到有點愚蠢的還帶着濃重鄉下味的少年，面孔上常常泛出天真的微笑，不知憂愁，難怪他會長得那麼胖。

然而，村田却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壞傢伙。那種壞法，真是不容易尋找到。尤其是對我，也似乎更有一種特別憎恨的仇視。他進來最久，年紀最大，便傲然覺得自己是號子裏的頭兒，腦兒，

飯的時候睡覺的時候，早上擦地板的時候，他便做了一個支配及指揮者；他自己挑選最好的筷子及「辨當」，將次好的派給松本，更次的指給池山或澀井，而將舊得發黑有時甚且斷了一段的筷子及份量最少的一「辨當」指給我；晚上睡覺，他不單選了離便器最遠的最好的地位，還佔據比較上最乾淨的毯及枕；早上擦地板的時，他不大動手，祇是指揮別人做，他從來就沒有傾倒過一次便器。記得有一次吃中飯時，松本代替他分配筷子，松本將頂好的一雙選出伸給他，而將次好的一雙伸給我，可是一道從鼠眼中射出來的兇光，使松本拿住筷子的手縮了回去，臉上升出一種頗為難堪的表情。又有一次，我無意中一聲噴嚏將他從睡眠朦朧中驚醒，便遭受了一頓惡毒的臭罵。

他穿着一件表面上畫有粗枝大葉的花紋及寫上幾個日本有名戲子的名字的白布和服，這是無賴流氓之類穿的服裝。他老是盤坐在不大為看守贖得見的靠門左邊的角度裏，背靠住水門汀牆，微閉雙目打盹，不大說話，也許覺得別人不配作他交談的對手吧。不過他有時也會說一說，那就是當他高興的時候，他會把澀井叫着坐近他的旁邊，他會用低聲的講解及手勢的動作，將偷竊摸扒的方法傳授給澀井。那時，那副滿是鬚鬚的老是板得頗有點傲然的神氣的面孔，

才發出一點得意的奸笑。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服過兵役的，當過「皇軍」的。我的號子中，松本及池山因眼睛不好，不合徵兵的標準，澀井還沒有到受徵的年齡，祇有他當過「皇軍」，怪道他那麼的神氣。後來聽松本告訴我，才更知道在七年前，他曾開到「滿洲」去駐防過。啊，原來這老奸巨猾的「泥棒」却是侵略我國東北的一份子呀！是的，其後有兩三天，當他帶着驕傲的神氣和松本、池山們談論他在「滿洲」時怎樣欺辱「支那老百姓」的「英勇故事」，夾雜一兩句不大明白的中國話及幾聲帶有得意驕傲，「光榮」成份的奸笑時，我的血沸騰了。假如那時我手裏拿着一支手鎗，我準會正對他的胸膛放過去。

然而，那也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們麻醉欺騙到至死不悟的人呀！既然替「帝國」效了忠，爲「陛下」盡了力，又在軍閥的驅使下幫着奪取了「滿洲」，可是他有什麼好處呢？在「皇軍」的獸皮一除下，等着他的是失業，是「泥棒」，是監牢。

又接連幾次秋雨，天氣驟然寒冷下去。雖然還是九月中，可是在終日漏不進絲毫陽光的陰濕的號子裏，已然有初冬的氣象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心情一天比一天更陷入在苦悶、悲愁的絕望中。

這時寒冷的侵襲，已經使我受不住了。照例，囚犯是可以帶一些衣服進留置場，可以要求警察署通知家人送來，松本他們每個人都帶得有一兩件和衣、短衣、褲之類。可是我的家呢？它在遙遠的海的那邊。而且，我以前就聽過友人說，凡是我國留學生被捕之後，不特不准接見朋友，甚且大使館派人去調查，警察署也絕口否認，說沒有這回事。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失蹤」，東京警察當局似乎可以全不負責。於是能夠從外面有一些衣服送進來給我的這想頭，簡直連影子也沒有在我的腦中蹣過。東京那幾位友人知道我被捕之後，我想，他們除了乾着急以外，是很難有辦

法爲我打點一些什麼的。這麼一來，我更會連帶地想起他們。我在心裏這樣問自己：他們會不會與我遭受到同樣的命運呢？他們會不會爲了我的被捕而自危，提前快歸國呢？我希望他們能夠這樣做。我已經自身嘗味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爪牙們底無理，殘暴，野蠻兇狠……它們是毫不用理由地拘捕迫害我國的留學生。少一個青年同胞落到它們手裏，我國的抗戰不就可以增加一點力量嗎？

然而，現實是不容情的，寒冷使人生理上須要加多一點衣服。那，怎麼辦呢？雖然松本看到我冷得發抖時曾經將自己一件衣服借給我披在身上，可是寬闊得像一襲袈裟的和服，於陰濕冰涼的地獄中，實在不會生出多大的溫暖。可是我想起前面伸延着一條永無終點的徑路，將來又怎麼樣呢？我能夠輕易地被放出去嗎？回答是「絕望」。那末，前面等着我的當然是青面獠牙的死神。冷，好的，讓它冷吧！松本叫我求看守通知特高室的傢伙，也許他們會從我的下宿館中給我拿兩件衣服來。可是看守的嘴臉與那種兇暴的顏色，使我寧願硬着骨頭與寒冷搏戰而不願受那種鄙棄的白眼。終於，松本看不過了，他替我向看守求情。

大概是九月二十三、四吧——地獄中人們不容易準確地把捉住日序，在上午十一時左右，

一聲熟練的「張」又從留置場的鐵門外傳達號子裏來，這是金盛的聲音，它會帶給我一張奸狡兇惡的青年人的面孔。又是「取調」嗎？又是鞭答嗎？甚至是死罪的判決嗎？帶着疑問，我出到留置場外，金盛一聲不響地領我上樓，當我踏進第二調室時，心頭竟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反應。原來鹿鳴館（註一）的一個下女，正雙手捧着一個小包袱站在裏面，臉上的表情是驚訝之中帶着同情，還是那麼訓良地叫我一聲「張樣」（註二）。數月的居留使我和下宿館的三位下女混得有點熟習了，這時我像是感到羞慚，但又像遇到了親屬一般感到無限的親切。可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也許我下意識地覺得我這時不應該說什麼吧。我默然接過包袱，解開來，裏面是我的。一套黑嗶嘰的大學生制服，一件襯衫和一件羊毛衣。下女出去了。金盛用命令的口氣叫我就在那裏換上，然後將穿得變成黃黑色散發着臭味的和服，連着那塊包袱布，一併拿出去交給站在門外等着的下女。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金盛再也沒有問什麼，於是我又被帶回號子裏。當我踏進號子，澀井帶

（註一）我所居的下宿館名。

（註二）女用人。

（註三）張姓。

着羨慕的眼光，向我的衣服儘在望。松本問我是什麼人給我送來的，我告訴他是下宿館的女。

衣服帶給我以溫暖，但同時也帶給我以更大的絕望。我知道，我大約一時絕沒有釋放出去的希冀了。假如我會很快被釋放，那他們當然不會叫下宿館送衣服來。不過我心裏又這麼想：送衣服來也許正爲了使我被放出去時不致穿着太醜陋的和服吧。人到了絕望的時候，常常會想出一些東西來慰安自己的。

然而，一天，兩天，……我的希望又漸次趨於死滅了。

一個人，當他的生之希望到達破毀的時候，那心情的變幻真會到達連自己也莫能測度的程度。有時，我會希望自盡這是一點死了好。每當晚間，當我躺在冷硬的木板上，生活的痛苦使我往往會這樣想：假如能夠毫不痛苦地死去，譬如說，若能夠墮入睡籠不知不覺地生之機能毀滅了，我真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我不再起來吧。可是明天清早，當我在看守的叱喝聲中醒來，我會暗地裏嘆一口氣，心裏在想：爲什麼又要滾着起來呢？

晚間的睡眠，可以說是地獄生靈中一段最快活的時辰。靜靜地躺着，感覺官能停止它們的工作，於是再不聽到兇惡的叱喝，看守那副難堪的嘴臉，再也不出現在眼簾，一切現實生活中的

醜惡都隱藏了。那一段才勉強可以算得是自己的時候。可是當看守的吡喝聲使熟睡的靈魂醒來那時心靈的痛苦簡直無法形容。自己就像從清靜的充滿幸福的境地被惡魔一脚踢得墮入黑暗的充滿痛苦的萬惡深淵。

有時我又會這樣的希望我希望晚上會失火，就算是從留置場中燒起的吧，一瞬間這一片人間的污黑地，這一個「文明」的污點化爲灰燼雖然連自己也化爲灰燼混在中間，我相信我會像一位殉道者一般精神上感到無限的滿足。但有時我更會這樣地希望，我希望我國的飛機會到東京來轟炸，來用炸彈粉碎日閥的迷夢，在一些巨大的一轟隆一聲後，我希望一顆重磅炸彈會恰巧落在本鄉區本富士警察署的留置場，那時我定會帶着快慰的微笑躺下去的。

而當我寂寥到無法想像的時候，我常常用種種回憶及幻想來消除我的無聊。過去二十幾年的任何一神細點凡有出現可能的都在我的腦海中溜過好幾遍乃至好幾十遍。有時我的幻想又會跑到遼遠的原野上騁馳，我幻想我能夠回到我可愛的祖國我能夠回到我可愛的故鄉，能夠見到我所愛見的人，那時我將要對重獲的自由如何珍惜我幻想我回國後能爲祖國的存在而努力工作，那時我將要用犧牲的精神去努力，因爲我這個從死神手指縫漏出來的生命，真

是一個多餘的東西，只要是爲了有意義的工作，再度的犧牲對於我，豈不是毫不值得悼惜的嗎？一想到這一個問題，便立刻出現在我的腦中：進獄以後二十多天與外界完全隔絕的這一段時期內，不知祖國抗戰將有若何的開展？

澀井那個胖孩子出獄了，那時該是九月二十四五吧。松本告訴我，澀井將被送回鄉下，由他的父母來管束。那一天的早晨，胖少年的圓面孔上發出光輝的歡笑，慈母的撫慰在等待他，自由的空氣在等待他，在自由的空氣下，生活在慈母的懷抱中，大約總比在萬惡的東京來得幸福吧？當他在號子外隔着鐵門的欄柵對我們作告別的招呼時，我真要爲這個天真純樸的鄉下孩子祝福。

澀井出去後，我的號子裏曾經接連地進來過四個新犯人，不過他們拘押的時候都非常短，有一個是一日一晚，一個是兩三天，其餘兩個祇是一晚。他們輪流着進來，即是一個出去之後，過了不久，又換上一個。第一個進來的是年紀二、三、四歲的茁壯矮個子，方闊的臉形，穿着一身頗爲齊整的和服，在下午三時左右被拘進來。照例，一個新犯人進了號子，不上一個鐘頭，他就會和舊難友弄得非常熟習。因爲號子裏的世界實在狹窄得可憐，譬如將五六隻雞困在一個小籠裏，

則它們的羽毛的接觸，却是必不可免的。而且號子中那種死寂的沉悶，會使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一點點小的事情在死寂的氣氛中泛起一些漣漪，於是每一個新進來的犯人，都會接受一番好奇的探問。那茁壯的矮個子，當然不能例外。從他的帶一點羞愧的談述中，知道他被捕的原因，是爲了在馬路旁店舖的窗櫺行竊，當目的物尙未到手，已給警察發覺，他立刻拔足飛奔，但終於被趕上，而且還被用木棍在頭上重重的敲了一擊。說着，他頻頻用手摸摸頭上隆起的一塊肉瘤，更俯低了頭指示給我們看。奇怪的是第二天下午，他就被釋放了，也許因爲他是初犯，而且東西沒有到手也？許因爲他頭都受了傷，所以早點被釋出去。我心裏在這麼想。

接着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人，眉目臉孔頗爲整齊，一看便知道並不是一個笨傢伙，可是他穿的是「白相人」所習穿的和服，化粧時用了過份的香料，使滿體的香氣過於難聞，頭髮梳得亮光光，進到號子中却和順得像一個小孩子。他被捕的原因，是爲了將自己家裏的東西偷了送進「質屋」。(註四)換了錢，送進遊廊。(註五)或賭場。照日本警局的說法，這該是「

(註四)當舖。

(註五)妓館區。

不良青年」了。可是以腐臭的社會爲基礎而產生的「不良青年」日本警察署除了把他關進留置場兩三天再釋放出去以外，似乎也沒有別的办法。

第三個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個子，「自動車運轉手」(註六)被捕的原因是駕車傷人，祇拘禁一晚，第二天就出去，也許是取了保，負擔了傷者的醫藥費。

第四個進去的是帝國大學病院的醫師助手，晚上十一點左右拘進來，已經爛醉得近於糊塗；被拘的原因當然是醉酒鬥毆，第二天就出去了。這樣，直到九月底，我的號子中還是我們那四個老搭檔——我會社員池山和兩個泥棒松本、村田。

至於整個留置場中，囚徒們也是不絕地進出的。所謂留置場，其性質約等於我國警察局的拘留所。不絕地一些被認爲有犯罪嫌疑的人，被拘進去，初步的審訊就由警察局執行，有罪的送到「刑務所」(註七)內，沒有罪的釋放。不過有些既犯罪而沒有到應進刑務所的程度或久審未決的犯人在留置場中住上幾個月，也是常有的事。

(註六) 汽車司機。

(註七) 正式的牢獄。

「扣留置場的單調到毫無變化的生活方式中使每一個人的神經都會關注到號子外的每一點最微小的事。對囚犯的進出更爲每人所不肯放鬆其注意的。整個留置場每天進來的新犯，平均總有五、六名，而每天出去的平均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數目。全留置場中有六個男號子和一個女號子，拘留的全部人數總在二十五至三十這個數字內上下移動。女號子起初是空的，後來最多一道關過五、六名。一個男號子中，最多一道關上六七名，最少兩三名不等。這種情形，於開放出去大小便的時候，留心一點，就可以觀察得到。而且甬道中靠近看守辦公的木桌的牆壁上，還掛着一塊黑牌，上面用白字寫出全體犯人的總數及男女的各數，小便回來時，一抬頭便可以一目了然。

當然，進進出出的人，正是二教九流，無所不有：有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婆，十二三歲的小學生，有做生意的，流氓無賴模樣的，穿黑制服的大學生，塗了過度香料而將整個留置場薰得香噴噴的妓女，下女裝束的少女……而其中最吸引我的注意的，却是大學生和不少的朝鮮青年，不用說人們被拘捕進去的原因是種種模樣，可是後二者被捕的原因，却幾乎都爲了「思想」與「政治」，說得更切實一點，可以說大都是爲了這一次的中日戰爭。

整個留置場所拘禁的大學生，最多的時候其總數達到全部拘押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最少，無論什麼時候，也有四五名。同樣的，他們既不斷的有新的份子進來，也不斷的有舊的出去，平均每天進出的大學生，總有兩三名。他們之中，以帝國大學——一所最貴族最神氣的大學的學生佔大多數，原因是帝大位於這一區（本鄉區）中。他們都被提到特別高等室去鞠審，不用說，他們都是「思想犯」，有「反戰」舉動或嫌疑。前幾次，當我被提到特高室去時，幾乎每一次都會到一兩個穿黑嗶嘰大學生服的「思想犯」伏在木桌上書寫那被指定要詳細寫述的「手記」。原來在東京，等候在稍具正義感的人面前的，就是監獄與刑罰呀。

出於朝鮮人也不少，有姓李的，姓張的，姓金的，姓朴的……起初當我聽到鐵門外提人時叫出這樣的姓氏，我疑心他們是中國人。後來向松本打聽，才知道他們却也是久已呻吟輾轉於日寇鐵蹄下的我的老鄰居。在他們中，四十歲以上的雖有一兩個，但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其中有兩個，據說是台灣人，他們大都在東京做工或經商。在中日戰爭大規模地開展以後，卑鄙胆怯的日閥的爪牙們，怕這些手無寸鐵的朝鮮青年會在東京「造反」吧，就對他們大量地加以拘禁。失去了家鄉的人呀，生活在日寇的治下，除了任人毫無理由地逮捕監禁外，還有什麼話說呢？

從九月三日進來到這時，大約有一個月了。雖然我沒有辦法清楚地知道這時是十月幾日，但於約莫中，我却可以大略地推算得到我住在地獄過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大約有一個月左右。真是連我自己也難於想像：關在暗濕的不見天日的小房中，有如一頭牲畜一般被指定時候起睡、吃、大小便，一個月的時光，究竟是怎樣度過了？

由於時間的久遠，留置場中的幾個看守，也於我的腦中變得並不怎麼陌生。留置場的看守，一共四名，他們輪流着駐守在留置場裏，每班兩人，其班次的時候是從第一天上午十點左右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譬如這兩名從今天上午十點駐進留置場，那麼就一直守到明天十點，等到另外兩名進來，他們便可以出去作一天的休暇了。留置場內，也有一間他們的小臥室，不過白天他們不能進去睡，而晚上，在囚犯們躺下到起來這一段時候中，他們兩人才能夠輪流地每人平分這段時間，進臥室內睡四個多鐘頭。即使在深夜，也總有一個看守在甬道中往來巡邏的。常

常常午夜醒來時，清脆而單調的皮靴「達達」聲，會深深地刺進我的耳鼓。有時，也會聽到幾聲兇暴的短促的叱喝，那是給囚徒們「不應有」的移動所引起的。

根據了班次，四州看守分爲兩組，其中的一組有一個矮短身材的麻子，瘦個兒，下顎微微突出，有一雙發射着兇光的利眼，叱罵時所發出那聲滑膩惡到使人皮膚會長起一些疙瘩，三十多歲，名字叫佐藤次郎，他是四名看守中最兇的一個，全留置場的難友都恨他，都背地裏阻咒他。記得還是我踏進去的第三天，正當早上放出號子外洗臉小便的時候，一個押在我對面號子裏的青年囚犯，不知怎麼觸怒他，便遭受到一頓橡皮棒的毒毒的毆打，不停息地總有三四十鞭。每鞭，每一下沉重的「拍達」聲，都銳利地刺得我的心在發顫。我想，這大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文明」吧。其後，仍是她，屢次因極微小的事情對囚犯加以痛毆。假如囚犯稍有一些他認爲不應有的舉動落入他的眼裏，或者當着他不高興的時候，粗獷的「馬鹿野郎」的罵聲，便充滿在留置場的每一個角落。常常爲了吃飯或大便過慢，我也會遭受這種永恆烙在我的心葉上的侮辱。

還有這一組的另一個，算是較爲良善一點，有一副方正的闊臉，可是面上老沒有絲毫的表

情，刻板到好像木刻的。年紀也是三十多歲，不大說話，不大罵人，有時也會靠近鐵柵門和囚徒們閒談幾句，不過有時當囚犯們有些不大「應該」的舉動落在他的眼裏，那他也會毫不留情地給你一頓痛罵，聽說他還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呢。

第二組有一個是長方臉四十歲上下的，叫做小田原。另一個肥頭大耳，戴着度數極深的近視眼鏡，三十七八歲，名字叫中川信之助。長方臉的小田，也是一個兇暴傢伙，祇是他的兇暴程度，略次於佐藤，所以四人中他應當佔着兇暴的第二把交椅。而他的兇殘的方式，却與佐藤略有不同，他非常陰毒，他愛用軟的手段使囚犯吃硬苦頭。譬如有些囚犯做出一點不合他的意思的事，他會吩咐分派「辨當」的人，停止派給那個囚犯一頓。往往某囚犯聽到分派「辨當」的人說出受看守的命令，停派他一盒「辨當」時，甚且連他對自己的爲什麼受罰也會莫名其妙。一盒雖然是冷硬的「辨當」，但它對於一個飢寒交迫的囚徒，是多麼重要到了不起的東西呀！這種「懲罰」實在要比佐藤的打罵還陰狠刻毒。又或某犯人爲了實在忍不住而要求他例外地放出號子大小便一次——這種要求有時佐藤也會答允，祇要碰到他高興的時候，可是小田這傢伙，或者一聲不響地不理會，不然，他甚至會帶着一臉奸笑向請求的人，說上幾句風涼話，然後背

轉頭來，又踱到別個號子的鐵柵門外探察去了。這真使急得無可奈何的犯人，有點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不過佐藤遇到囚犯向他作那種要求時，他也使用着一種惡辣的方法。他訂了一個規則，凡例外要求開號門上廁所的，須以受橡皮棒打屁股爲交換條件。小便者三鞭，大便者四鞭。當然，他所以如此，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獸性，那就是爲了想用這種手段使別人不敢向他作那種要求，他便可以省却一點麻煩。爲了大小便而願意受這種卑辱的體罰的人，當然是極少數。但也間或有一些急得沒有辦法而又不怕打屁股的人，硬着頭皮，作那種請求，於是小便後回來，便須伏在甬道中的一把椅子上，將屁股突得高高，接着是三四聲響亮的「拍拍」，接着是佐藤幾聲高亢的獸吼一般的哈笑。可是，若果逢到佐藤不高興，即使願意以打屁股爲交換條件，但他也會置之不理的。

至於中川，那該可以算是四名看守中最善良的一個了。鼻下長有一簇仁丹鬍子的圓臉，常常有着一點微笑，他有時打着哈哈與囚犯們說笑幾聲，有時真是天真得像一個小孩，在鐵柵門外向號子裏的犯人裝鬼臉，引人發笑。全留置場的囚犯，對他都會感到一點親切。逢到向他作什

麼要求時，祇要不妨礙他的職責，要求者大約準可以得到滿意的答覆。

看守們並不動手做一些事，除了開關鐵門及收釋人犯以外。留置場中一切的服役，如洗地板，分發「辨當」……等類，都由看守就囚犯中選擇一些拘押時日較久的，於需要時叫出號子外去做。甚至看守的皮靴，也要犯人擦，看守臥室中的被褥，也要犯人收拾。有些進去比我遲的犯人，也被命令着到號子外服役了。可是我，除了一次被命將看守房裏的被褥拿到留置場外，空場上曬曝外，還沒有在留置場中做過其他的服役。這種「優待」也許是受賜於「異國人」這三字吧。

誠然，在我的心目中看來，不用到號子外服役該是一種值得欣幸的事，可是看守們的看法，也許適得其反。我心裏想，無疑的，看守以為每一個囚徒都高興於做那種服役的，確，大部份的囚徒是這樣。其原因，第一，人是一種好動的動物，長期盤坐於四堵水門汀牆壁圍成的毫無變化的號子中，真是死靜到了極點，於長久的靜極之後，服役時那種走動，對囚徒們也變得具有不小的引誘力；第二，服役完好後，還可以抽空到盥洗處大小便，或將穿得發臭的衣服拿去洗淨；第三，逢到分派「當辨」的服役，分派者往往可以額外吃地吃一些初進場來的人犯吃不慣而剩下的

剩餘，這對一個受飢餓磨折得對什麼食物都感到異常的香甜的囚徒也是一件難得的恩賜。於是被叫到號子外服役的囚徒，竟然會爲枯坐在號子中的難友所羨慕。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是當你一動也不能動地盤坐在一間陰暗的小房裏一兩個月，你便會衷心同意這種說法的。

還有，爲看守選挑着叫出號子外服役的，類多是平日非常馴良而不爲看守所「憎惡」的人。譬如我的號子中，村田的「盤坐面壁」的資格要較松本老。但是松本被叫出去服役的次數又多，村田簡直從來沒有過一次。由這點，可以證明看守把「服役」竟認爲是一種「施恩」。『支那人』是他們所歧視的，當然不肯將這種恩施於「支那人囚徒」的身上。然而這種「不肯施恩」之於我，竟然是一種「優遇」。這點，也許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他們那裏領悟得到被奴役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絕不是肉體上一點小便宜所能補償於萬一的。當然，慣於馴服地被指使而不知精神享受爲何物的人，不在此例。

此外，我還可以舉一些看守對我這個「支那人」特別歧視的例子：譬如初進去不久，我也曾向看守要求過例外的開號子門，當排灌急得沒有辦法再忍的時候。可是幾次的無理，甚而至於得到叱罵的回答，使我以後再也不作一次這種「請求」。尊願咬緊牙筋，用死力忍着。又如鄙

視的眼光及表情，會常常從看守兇惡的臉上降到我的身上。尤其是當我踏出號子門，看守的一些含着輕視成份的冷笑，會向我的臉上投擲過來。好笑吧，看你們這些威風能夠施展到什麼時候。

十

松本出獄了。在松本出獄前一星期，村田那壞蛋是已經被釋放出去。村田的釋放，於我沒有引起半點精神上的反應。若有則是我希望他早一點滾出去。雖然這個希望對他是有利的，然而，對我也像是有利的；至少，沒有這樣的壞傢伙住在同一的號子中，我精神好似輕鬆了一些，我可以少看一點使人肉麻的傲然的眼色，少看一點裝模作樣自擺神氣的臉色；恰如在空氣中少滲雜一些惡劣的氣息一般。人生活在這樣的空氣下，精神不是要來得較為爽快嗎？

在出獄前，村田還裝過一回病。他的病，靠得住有一半是假裝的。不然，那該是這個老牌「皇軍」也受不住這種生活的磨折了。他有兩頓不吃飯，發出低微的呻吟，他向看守要求弄一點粥。

吃，可是到第三頓，粥沒有弄到，他依然吃起飯來了，不過祇在「辨當」的木盒中略微剩餘一點。以後每餐他的「辨當」都有二點剩餘，不過他的呻吟聲却逐漸來得響朗。不久，他就被釋放出去。我想，他的病與他的釋放，也許不無因果的關係。我更想到這個有過「光榮」歷史的「皇軍」出去後不久，定會再踏入別的警察署的留置場。據說，他這一次「吃現成飯」已經是第四次。

然而，松本的出獄，於我却好像失去了一位親摯的老友一般。當那一天下午他被提出去問話回來時，他帶着歉疚與些微惜別的表情，告訴同號子的難友們以他明早出獄的消息。立刻，一陣不大愉快的微風，捲上每位難友的眉梢。同號子的每一個難友，對他的離去沒有不感到一點戀戀；當然，也沒有一位難友會希望他永遠禁押在留置場裏。

松本明早被釋放的消息很快地傳遍整個留置場，晚餐後，當放出號子外作一天最後一次的大小便及搬進破氈爛枕等東西進號子裏的時候，我曾親眼看見別號子的難友們，在親切地向他作着惜別的招呼。

吃過晚餐的「辨當」，看守對犯人的注意略微放鬆，那時松本就向同號子的難友們分別說一些告別的話，他低聲地向我說：「天氣在漸漸冷下去了，以後要多穿一點衣服呀。」

在這種無國界的真摯的友情下面，我除了衷心地有着無限的感動與感謝以外，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在這個充滿奸詐欺騙的世界，這麼深厚的友情是難得的，是可貴的，而況正處身於四周都是迫害的患難中。

「你快會被釋放的，出去了，你還是立刻回國去吧！」他這樣安慰我，我祇能默默地點一點頭。

當天晚上，他向看守請求在他進來時被看守搜出代為保存的錢中拿出一塊錢來，並請求看守代為叫人去買「菓子」（註一），當然，若果是別人，不單看守絕不會答應，而且他自己也絕不敢作這樣的請求。然而，松本，他真是留置場中的寵兒，難友對他好，而看守也對他好。他這個請求，居然順利地被答允了。「果子」買回來，看守拿下一小部，其餘都拿進號子中，而且於得到看守的准許之下，松本還將別號子兩位平日和他於服役時弄得頗為要好的難友一起約到號子內。雖然小小的兩包「菓子」，但它們在久已沒有嘗到甜味的囚人的味覺上，是會引誘起巨大底反應的，而況它們還滲雜有一些親切的友情。

（註一）糕點餅餌

第二天早上，松本出去了，帶着欣忭的表情出去，在全留置場的難友惜別下出去。

看到別人出獄，囚徒很容易被惹起一種對自身的悲感。看見他人接觸到自由，那時自由所具的誘惑力便會更加增大。除了對別人生出一種羨慕外，往往會反轉來問自己一聲：自己什麼時候能夠離開這個醜惡黑暗的地獄呢？

我在期待，我在期待這呆板到死寂的生活能夠生出一點變動，不管是好的變動或壞的變動都成。可是我心裏却也有點怕於聽到那一聲「張！」我懷疑它會帶給我更壞的命運。

那一天，約莫是早上八點左右，那一聲爲我所不願聽到而又似乎爲我所希望聽到的「張！」又在留置場的鐵門外響了起來，仍然是那個熟習的聲音。我懷着疑惑，出到留置場門外，金盛那副刁滑的面孔，已在等着我。他領我上樓，領我進特高室裏，那時特高室內還是空空的，沒有一個人，辦公桌上一些文具表冊，靜靜地躺着，掛在壁上的圓鐘，發出清脆的「的答。」一看還差五分鐘才到八點呢。金盛一言不發，自己坐到靠近門口的桌旁，然後指着對過桌旁的一把圓椅叫我坐下。他拉開抽屜，拿出一些表格來，自己低着頭在填寫，我以爲是與我有關的，我裝做不大注意的神情，向表格上瞟了幾眼，那知它們竟與我全無關係，那祇是一些居留東京的外國人調查

表金盛獨自在辦他的事，於是疑惑像孩子吹着的橡皮球，在我的心裏逐漸擴大起來。叫我去作什麼呢？也許等他辦完了這調查表方面的事，然後再辦我出獄的事吧？也許又要審問了？

許……？

乘機，我將眼光在室內溜了一圈，我帶着驚異發見到掛着的日曆上面還是一個二字，我真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爲什麼時光竟然跑得這麼慢？坐在號子中，我盤算着，推計着，我總覺得這時應當是十月七八日了。我踏進地獄中好像已經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歲月。那裏能夠推想得到，一直要到當天晚上十一點，我的入獄才恰滿一個月呢？

眼光再溜到一扇窗門的玻璃片上，由於它後面有着深灰色的背景，所以它竟然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我的面形來。一看，我不禁又大大地吃了一驚，我簡直不敢相信它所反映出來的面形是屬於我的：在野草一般蓬鬆雜亂的長髮下，是一副流血過多臥病數月的病人的面孔，它瘦削得退失了人形，青白的顏色甚且可以從玻璃片的反射中看得出。我對着那副不相信會屬於我的怪面孔出神，我心內無所謂悲傷，簡直全無感想。

正當我木然望住玻璃片的時候，一個聲響將我喚醒轉來，這時，一個穿白衣的待役模樣的

人進來，雙手捧着一隻小白洋磁盤，裏面放得有一杯牛奶和一碟蛋糕。金盛指着叫他將它們放在我面前，待役出去了，金盛作着手勢叫我吃。我摸不着頭腦，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然而我這時所唯一能夠做的，除了吃之外還有什麼呢？奇突的現實使我的心裏有些不安，我沒有辦法回答自己這於我究竟是禍是福。這種情形，使我的雖然被食慾煎熬到了近於無法忍受的程度的嘴巴，對當前的「美味」也不感到巨大的引誘。我胡亂地吞着，喝着，不覺得有滋味地。我心裏想，這是刑前的享受呢？還是釋前的優遇？

——吃完，我仍然繼續着孤坐。

這時，特高室中又進來了兩個穿西裝的，他們向我投擲一瞥輕蔑的眼光，坐到桌子旁，辦理他們的「公事」去了。而這時，金盛還在繼續地寫呢。因為距離得並不怎麼近，而且我覺得這時東張西望地探看，對我也許是沒有益處的，所以我索性再也不去留心察看金盛究竟在寫着一些什麼東西。

我這樣樣地孤坐着，直到九點多。其時，特高室中的人員，大約也到齊了。除了肥矮的千田主任和狡猾的刑導今盛還有另外的五個，年紀從二十多到五十多不等，有肥頸突肚的，有滿臉鬍鬚

鬚的，他們一律都穿着日本型的西裝。進門後，都照例鄙視地向我瞟一眼，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有在理頭做自己的事的，也有在高聲談笑的。

這樣坐着做什麼呢？種種想像中的疑問使我腦神經有點迷糊。金盛的一聲叱喝，像一根刺一般將我刺醒。目光向聲音的來源掃過去，我發見金盛已經結束了他的工作，他作着手勢，命我站起來，他也站起來，我揮着出門外去，他也跟出去。他一直將我送下樓，將我再送進留置場裏，他始終沒有同我說一句話，我再坐回號子內陰暗的角落，回味那幾小時的遭遇，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於是一個絕望的陰影，又一次爬上我的心頭。我暗自思量，我想我一定再沒有出去的希望了。我是用這樣的推理來作成這個肯定的結論：一個遭受長期監禁的犯人，既然還有一筆錢存在警局，刑事偶然發一點慈悲，給犯人一點死前的口腹的享受，也是常有的事。反之，假如我會被釋放，我存在他們手裏的錢，爲數是免強夠作回國的旅費，現在再爲我而作這種「奢侈」的支出，那末，將來他們不是要賠錢送我回去了嗎？我反覆這樣推想，於是我祇好肯定了自己的死所。

這道時，號子內的靜寂，是特別要使人難堪。自從松本出去了，寥落的氣氛，掩覆在號子中一日

比一日沉重，更兼幾場秋雨，號子裏充滿死的氣息。

松本出去不久，跟着又進來了兩位難友。先進來的那傢伙，一副丘八模樣，簡直比額角上標出了記號還要明顯。個子不高，滿身滿臉的橫肉，表現出體格頗爲茁壯。然而，他那副兇狠的臉形，一看會使人立刻感到惡心。四方臉，鼠獾眼，尖突的鼻頭，厚扁的嘴巴……我的筆拙於描畫了。

真正是的事實證明我的觀測半點也不錯，他正是一個剛剛在半年前退伍的「皇軍」。他年紀祇有二十三歲，二十歲入伍，兩年中大部份的時間裏駐在「滿洲」。他帶着驕傲的神氣向池山說自己是「滿洲里」的守衛兵，接着他作手勢比了一比，然後說那邊冷呀，雪下得這麼厚。他的名字叫做吉村陸郎，據他說，退伍後就在一片青物屋（註二）裏當店員。爲了多用去店裏一點錢，於是被店主通知警局拘來了。我想，他的所謂「多用」還是寫成一個「偷」字也許更爲恰當。可是這個蠢材，大概一生也將不會想到是他的主子——軍閥叫他上當的。爲「帝國」效忠，到冰天雪地的滿洲里去駐防，果然是爲着守護「滿洲國」嗎？守護「滿洲國」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軍閥們奪獲「滿洲國」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即使爲了偷錢而被禁在留置場中，吉村的

愚笨的頭腦，也絕不會想到這些問題。

吉村對我的仇視，實亦不減於村田，也許可說更甚於村田吧。每逢集擁在一塊兒吃「辨當」的時候，他那一雙老鼠一般的眼睛，便會向我送來幾道仇視的眼光，他似乎覺得這麼一盒冷硬的「辨當」給「支那人」吃也是他們「帝國」的損失。有時，他更會指桑罵槐地低聲說一些冷潮熱諷的話，像一把尖刺一般向我擲射過來。我知道在那種環境下對付這種人的唯一良好的方法，就是「不理」。從他進來以至出去，這中間我不特沒有和他略作交談，甚且我沒有拿正眼看他一下。記得有一次，他被告出去「取調」之後回到號子中，帶着得意的笑容，特別告訴我一個消息。他說日本空軍去大炸廣東，廣州發生大火。我聽過後，一聲不響，甚且臉上不露半點表情，他似乎感到失敗。

我深深地明白，每一個日本兵的腦內，早已給軍閥注滿了毒液。我想，除了最殘酷的現實或者會將這種毒液消解外，他們實在是無可救藥的，他們受麻醉，受欺騙，受利用，他們也算得是一種可憐的動物吧。

在吉村之後，進號子的，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而資格頗老的「泥棒」。他一踏進號子，就毫

不在意地甚且以欣快的語調說自己又一次住進「亞巴德」(註三)後來，他告訴我們，留置場比他自己的木頭破房子實在要更好一點，有水門汀的牆壁，有電燈，有地板，還有現成的「辨當」吃。他笑嘻嘻地說，住得愜意。

這個傢伙，不用說是留置場的老主顧。一進號子，他便乘着看守不注意，大肆活動起來，指手劃腳大吹法螺。記得就是他進來的第一個晚上，爲了吃「辨當」時偷了一根筷子撕折開來作牙簽子，因而給麻皮看守佐藤拍了兩記耳光。

然而，可惜的是這位希望住「亞巴德」的泥棒，住不了幾天就出去。正是天下事不如意的，十居八九呀。

(註三)較上等的公寓。

十一

寂寥對一個人的冥想是大有助益的，隨着號子裏的寂寞之日趨深濃，我的幻想就變得更

爲多權化這時正有一個似乎頗爲嚴重的事情作爲我思考的東西我努力要在前面等待着的絕望的境界中，找尋一些希望的花朵。

首先，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他們要將我長期禁錮住呢？他們以怎樣的意義去估計他們自己的舉動呢？於是我發見到作爲我被長期禁錮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他們對我的懷疑。我更努力去探求，在我的擬想中，作爲他個對我的懷疑的主要點，大概不外三件：第一，爲什麼一個到東京不久而日本話還不能說得十分流利的「支那人」會有着十多位分散日本各地的日籍友人；第二，那幾篇原稿不是間諜的報告是什麼；第三，我和那位他們口中的×××幹部的王志清，一定密有聯絡，雖然王志清的色彩靠得住是由他們一手塗上的，可是那也總是我的罪狀呀。

的確，在我以前的供詞中，我是沒有很清楚地說明這幾點的，不過這幾點也着實不容易說得清明，它們正像一部二十四史一般，每一點都不知應當從何說起。因爲每一點都幾乎與整個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聯，要說任何一點，就非得從頭至尾地把整個生活的過去都說出來不可。過去幾曾有過這種機緣給我從容說出來的呢？而且即使說了，對有意殺害我國無辜青年的日

關的鷹犬們，應當是毫無反應的吧！

不過我又想，假如我能夠有機會再將這三點夾雜着我的生活史說個明白，也該是一件痛快的事情。當他們完全知道我的過去生活因而連帶知道那三點實在了無可疑時，我想他們又將以什麼理由來禁錮我呢？又將以怎樣的手段擺佈我呢？這該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此外，也許我還有一點潛藏在骨髓深處的所謂阿Q意識吧。我那時總覺得能夠將那些疑點解說明白，即使真的死在東京的牢獄裏，似乎也可以無憾了。我所以作如是想，當然也自有道理。蓋當我說明白我是毫無罪狀以後，也好使那些鷹犬們知道自己的確陷害了一個完全無辜的異國青年。

此外，我也未嘗不略存十一之望，我希望以解釋這些疑點來換到釋放。

於是，我決定了，我決定必不放過這種機會。假如我再被叫出去問話，我一定要詳細解說一遍。我要用正義去和帝國主義的鷹犬決鬥，雖然我懷疑所謂「正義」放在他們的心目上究竟是什麼東西。祇是那時我對「正義」的力量仍沒有完全失去信仰，我想至少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在陷害無辜那也算得是一種報復。

我就開始計劃進行的步驟。首先我應當向他們聲明自己以前的供詞，有許多不盡不實之處，然後我要求他們允許我一些時間，給我再詳細地寫述一張供狀。是的，寫述比口述要好，因為我的日本話實在還不夠使用，作長篇的說白，用中國話向翻譯吧，但我總覺得口講沒有筆述來得詳細，來得清楚。而且嚕嚕嚕嚕的口述，會使聽的人不耐煩，遺忘了。於是我決定採用寫述的方式。我開始打腹稿，我想最好還是從我的祖宗說起，將怎樣從世宦之家變為破落戶，怎樣從中學而至留學，怎樣認識日本的世界語同志以及王志清，乃至為什麼譯文章等等，說得一定務求其詳，應當採用自傳的方式，以年月先後為序，一件件從頭至尾說下去。在可能的處所，我應當寫出一些人證與物證來。我可以用中文寫，再由翻譯去處理好了。腹稿作了好幾天，一個大略的輪廓已然存在於肚皮內。祇等再一次的審問，我便可胸有成竹地依計而行。我想，再度的審問大概不致於沒有的吧。於是期待又一次爬上我的心頭。

一天，兩天，三天……所謂再度的審問，還是渺茫得看不到一點影子，甚且連一見特高室的刑事也成為無法希望的事。我問社會員池山，我有什麼辦法可以一見特高室的刑事，他答得有趣，他說除了刑事來呼叫，大概是沒有辦法的。『譬如我有事情要和他們說呢，』我說。他搖一搖

頭，然後回答我：「要說也是沒有辦法的呀。」

「不能託看守代爲傳達這個意思嗎？」

「不能。」

我知道和這個傢伙商量，實在毫無用處，我決定耐心在等，總不會在我的生命毀滅前，就沒有辦法再見到特高室的任何一個傢伙。

在一個新的期待中過了五六日，一天早上八點多鐘，我又一次被金盛叫出去。一切的情形與上一次真好像一個模型中印出來一般，我又被如法泡製。起初，當鐵門外響起來一聲「張」的當兒，的確也會略微引致我的心弦一個虛渺的顫動。我想，會有一些什麼好的變動來臨吧。可是當我坐到特高室內，金盛又照例一聲不響，趕着辦自己的公事，祇不時用狡狴的憎恨的眼光向我掃射一下。不久，一個穿白衣的待役模樣的人，又盛來了一杯牛奶，一碟蛋糕，放在我的面前。其時，我全部神經，却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面：我怎樣抓住這個機會呢？

面前的東西我吃了，我簡直無法體會到自己吃的是什麼。大概是杯中已空，我本能地將它放下……我怎樣捉住這個機會呢？

抬起頭，眼光在室內作一周的巡視，掛在左邊牆上的日曆告訴我一個概念：「十月十一日」。我略微覺得時光跑得過於遲慢。接着，我的眼光却與一道陰毒的冷冷的眼光碰在一起，一個故作的好笑，使我暗地打一個寒噤。金盛像給什麼東西觸醒，似乎忽地想起一件什麼事情，於是陡地拉開抽屜，拿出一片白紙，用鉛筆在上面畫了一陣，擲到我的面前，要我看。原來上面寫的是兩項帳目：牛奶兩杯四十錢，菓子四十錢（註一）。

我看過，點一點頭，於是他再在紙上寫出「五十圓」，然後向我說：「是你存在這裏的錢。」依照我的回憶，到我進留置場時，我放在下宿館的皮箱中的現款，還有六十多塊日元，而且我的學生制服袋中的銀包內，也有六塊多零碎鈔票銀角。這些當然都在他的手裏了。他既然說祇有五十塊，我知道我祇好承認是這個數目。我點過頭以後，就乘機跟着問：

「我希望一見警視廳的官吏，能夠嗎？」

「作什麼？」他突起眼睛，惡狠狠地問。

「我希望能夠向他們說一個明白，因為我以前的供詞中，有許多說得並不詳細，而且也有

（註一）一個約當銀圓一分。

一點是假話。」我以為這樣說會具有較為濃厚的刺戟性。

果然，他聽到我說有一點假話，忽然變得興奮起來，帶着兇惡與冷笑：「嘿，假話？那末，他們來了，你會說真話了吧？」

「是的，過去所以說了一點假話，是萬不得已的。假如他們能夠給我較多的時間，我可以詳細說一個清楚。祇是……」

「那末，你要將怎樣調查日本出兵的情形都說出來！」他用急促而兇狠的聲調，截斷我的話。

「等我詳細地說出，一切就可以明白的。」

「好，我通知他們看。」說過，金盛就向桌旁的電話筒打起電話，他打到警視廳的特高課裏，他強調我說假話這點，并說他們來了，我要向他們說出真話。果然，這兩個字的效果真有點「不思議」，那方面答應了。金盛掛上話筒，回過臉來向我說：

「他們答應來，你先下去等着吧。」

我站起來，金盛忽地哼了一聲，帶着冷笑說：

這句話并不使我驚異，我早就預料得到他們是這般存心的。祇是等到我詳細說出一切，看你們又要如何擺佈？

兩個鐘頭之後，我被金盛再叫出留置場，再一次被領進樓上特高室旁的「第二調室」裏，室中早已坐着那兩個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熟識的劊子手，像兩匹餓狗在等待食餌，都帶得有一副貪饒的嘴臉。橡皮鞭的創痕又在我的記憶裏變得新鮮，憤恨燃燒得我的內心劇烈作痛。我用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我會不會從這兩名劊子手的手中得到再生？

我默然不語，我鎮靜着自己，我照例坐到那張坐過幾次的小圓櫈上，我等候對方的發言。矮胖子突大眼珠睜住我，滿臉殺氣，嘴角旁的肌肉隱約在作微妙的抽縮。戴眼鏡的高個子翻譯，用流利的北平話向我發問：

「上次你說了很多謊話呀！」

「是的，有一點點。」我成竹在胸。

「爲什麼要說謊話呢？」

「唔，那時沒有充足的時候給我說得明白，我祇好糊塗地隨便回答你們的問話呀。」

「那末，你就將假說的地方再說出來。」手裏拿着鉛筆，似乎馬上要寫我的真供詞。

「實在也不容易說得清，每一點都與整個生活有關聯的，你能夠給我較充份的時候嗎？」

他沒有回答，我假定他是默認，於是我再作進一步的要求。

「我希望將過去的一切，從頭說出。當我把過去全盤說出後，那麼一切你們自然會明白的。你能夠給我紙筆嗎？」

紙和筆被擲到面前，我立即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一個這樣的綱目：

(一) 家庭的歷史及狀況。

(二) 十八歲前的一般狀況。

(三) 十八至十九歲到福建讀書，那時開始和日本的世界語者通信。

(四) 十九至二十二歲，在上海過的學生生活。

(五) 二十二歲夏季到北平，直住到次年春東渡——在北平如何開始過賣文生涯，如何

碰到曾經通過信的日本世界語者鈴木幹治。

(六)二十三歲(今年)春天由北平經大連到東京，由鈴木介紹得識王志清。

(七)在東京的生活狀況。

這樣寫好，我伸了過去，戴眼鏡的翻譯員仔細地看著。乘著這個空隙，我再也不等他的允許，我繼續在紙上開始寫第一項的正文。寫了兩三張稿紙——印有警視廳三字的紅格稿紙，交過去。初時，那翻譯員看到我祇是寫一些家庭歷史，似乎有點不大認為滿意，於是叫我不重要的可以不必寫。等到寫及學世界語和怎樣與日本同志通信時，他似乎漸漸感到興趣，不時將一些要點用日本話講述給矮胖子聽。矮胖子聽了，圓圓的眼球就轉動起來，不時用冷利的眼光，向我的臉上瞟過。這樣，從十一點左右起一直寫到下午五點。「辨當」也被拿到上面吃了。

二十張稿紙給黑字填得滿滿，可是還沒有寫完。五點鐘大概是他們下辦公室的時候。而且半天悶坐，矮胖子也大感不耐。於是他站了起來，將一切東西都塞進那隻膨脹的舊皮包內，也不說話，自己跑出「調室」。翻譯員向我說，寫不完的明天續下去，明天他們還來。這之後，我再被他們轉交到金盛手中，帶到留置場內。

第二天，吃過午餐的「辨當」不久，我又被叫出去，領上樓。其時，第二調室裏祇坐着那帶眼

鏡的翻譯員，像一匹乾得許許的獵狗一般的矮胖子，也許知道已經沒有獵獲什麼食料的希望，所以沒有來吧。我感到室內的氣壓輕鬆了許多，我坐下開始補寫未完的一小半。待到寫完，也快到五點了。連昨天的「共三十二頁，真像頗有點洋洋大觀的一篇急就的自傳。」

那翻譯員也將一切塞進皮包，我又被領進右邊的特高室，他開始和金盛作着簡短的討論，探討的結果，他才以不大肯定的語氣，對金盛說我大概不是「斯派衣」。(註二)

於是他轉過臉來，顏色變得略微溫和一點，對我說：「你爲什麼不早些這麼寫出來呢？」

我祇好默然，我沒有用明確的聲浪去回答他這句話。假如定要我回答出爲什麼，那我只好歌頌日本的「文明」刑具的偉大。

「你大概不要緊，放心吧！」這麼說過，他寫下兩個題目，交給我，然後對金盛說，他自己還有公事要早點回去，叫我將那兩個題目寫好了交給金盛。那兩個題目第一個是「述說你對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的印象及關係」，第二個是「述說你對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的印象及關係」。其實這兩點在上面的「自傳」中，已經大略說過了。這時，我祇好較爲詳細地再寫一遍。

主要的幾點大約是辯釋明白了。爲了拿稿費而譯文章，我註明這點和我在北平相處一年的鈴木可以證明。與王志清的認識是由鈴木寫信介紹的。由這點可以證明我與王志清相交極淺；至於與日本世界語者通信的目的，是爲了交換風景照片及刊物舊郵票之類，這點我註明凡曾經和我通過信的日本世界語者都可作證。

當我再度坐歸號子，我心頭恍惚放下。一塊千斤巨石，我似乎感到有點死而無憾了。

十二

誠然，在「自傳」式的供詞寫過，我內心也不免萌生半點希望的胚芽。我想到這一階段，那些鷹犬們對我該是無可懷疑的了。假如略微有一點人性，大概也會爲自己的迫害無辜而感到慚愧吧。我希望有這麼一天……

然而，一連幾天又依着老樣過去，沒有一絲一毫的動靜，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絕望的陰影又逐漸在我的眼前擴大，擴大到掩覆住任何的一切。

一個人到了面臨死神，心境的幻變簡直會連自己也感到驚異。當我假定自己沒有再活着出去的時候，我的心境反而變得平靜了。我那時的人生哲學，應該是一種聽天由命的定命論。漸漸地，不期然地，我對宗教發生一種迷妄的信心。我想起佛教慣用的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於是覺得佛教是偉大的。在以前，我覺得天主教徒彌留時還要請牧師在床前作祈禱，實在毫無意義。可是，當我面對死神的時候，我是深深地了解一個陷於絕望的臨終的人，那種祈禱，實在會給他以無上巨大的安慰。那時，他會對自己過去的一切加以深深的懺悔，而那時，他大概會對自己所有的仇人付與最寬容的饒恕的；同時，他更會對自己所有的友人付與無限的懷戀和祝福。

我懷戀我的友人，每一位曾經贈我以友情的相知的臉孔，都會在我的眼前變得非常偉大；而同時，我也寬容地饒恕我的每一個仇人了。

這時，號子中又有新的份子加入，是一個穿西裝年紀三十多歲的瘦個子。據說，他是一片小吳服店（註一）的老闆。一天酒喝得酩酊大醉，他乘着酒勁，跑到債戶家裏討債，一言不合，動起武

他沉默的功夫，真是相當的到家，難得看見他開口，難得聽到從他口內漏出來的聲音。而且他一直盤坐得樣子頗爲講究，美觀，端正，像佛殿上泥塑的彌勒佛，甚且人們不大看到他移動一下。

慢慢地，我被傳染上了。悶坐得無聊到極頂時，我也端端正正地打坐起來，雙手合什，雙目微閉；雖然我的記憶中找不到可以唸誦的經典，但忽然給我想起了一些少時背熟的一些古文，於是當我盤膝打坐的時候，我便開始用着低到祇有自己才聽得出的聲調，將它們像經典一般背驗起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這種動作上，出乎意料的，它對於寧靜我的心情，竟然具有相當的效果。漸漸，我的心潮由是而低降下去，變得平靜了。一到端正地盤着膝合着掌，裏開始最低聲調的喃喃，我腦子裏再也不想到其他的一切，我像得一小解脫，我可以借着這種動作來消除許些現實的痛苦，初時，由於不慣，盤膝打坐的姿勢最多約莫可以支持二三十分鐘，超乎這一時間的限度，腿就發麻，非得改換一下盤坐的方式不可。到後來，可以支持的時間的限度逐漸加長，像老僧入定，盤坐合什，甚且可以維持到一點鐘以上。跟着，它就成爲我每天主要的唯一的功課。起初還好，漸漸，難友們對我的這種動作發生意，當我閉目打坐時，我聽到好幾次他們在切切私

語，他們認爲這一定是一種宗教儀式。當他們注意到我的喃喃，他們便肯定地認爲我在唸經，他們認爲我一定是佛教或什麼教的信徒。其後，甚且看守們對我的這一動作，也加以注意。有一兩次，在我盤坐閉目的當兒，我聽到看守在鐵柵門外和號子裏的難友交談，對我的動作加以研究。難友說我在唸經，看守似乎也這麼地相信了。祇是盤坐是獄中一種標準的姿勢，看守似乎沒有干涉我的意思。

別人該以爲我發瘋，而我自己却欣然於自己已經發見一條使用時間的途徑。其後，這種途徑還在日漸演進着，我又發明兩種消磨寂寥的良方。於是我除了背誦文章，我每天更抽出一部份的時間來，用手指在地板上寫大字，把小時曾經臨摹過的蘭亭集序及曹娥碑之類，在腦中挖掘出來，再用手指一字一句地將它們顯露在地板上。我發見到這不單是一種使用寂寥的好方法，而且手的揮動大概也算得是一種運動。此外，有時我會用極低的聲調，好像和別人對談，把捉住一個問題，來充份地發揮自己的意見。我已經不自覺地或不自禁地這樣做了。每當我的某一種理智來臨之際，我會懷疑自己這樣下去會不會真的變成神經病患者。我想，這種情景實在頗有將一個人弄到瘋狂的可能。

留置場中也常常關進一些神經病人，他們究竟由於什麼原因而在神經中加入一點爲別人所認爲可笑的質素，我雖不能夠清楚地知道，但是，好淺度的經驗，使我深深了解這些做出別人認爲可笑的舉動的，實在是世間最可憐的人們，也許可以算是世間最直率純真的人們吧。

大多數是在夜深，有好幾次我的意識被一種巨大而嘹亮的號叫聲從睡夢中喚出來，留置場中的夜的靜寂使我便於傾聽，而且可以聽得非常清晰、細微。我在努力從這些聲音中辨別它的主人的情感的變幻於是我的心開始微妙地抖動了。我不感覺到滑稽可笑，我祇是感到人世間最大的悲哀。

已然有過好幾次了，都是在夜深，我聽到一種非哭非笑的，簡直難以說明它究竟屬於那一類的號叫；有時則是一種哭笑間作或雜作；有時是怒罵，有時或是祇說着同樣的一句話一直說到天亮，有時是憂怨悲哀的嘆息，有時是豪邁的狂笑，有時……我從這些聲響中，看到入世的淒涼，悲慘的打擊，殘酷的迫害，銳利的刺激……然而，發出這些音響的，是被一般聰明的人們稱爲瘋子的呀！

瘋子進來，十九是在夜間，可是第二天早上，便被押出去送到瘋人院。他們置身留置場中，爲

時既非常短暫，而且又多是單獨被關禁在一間號子內，所以他們的瘋貌、瘋狀、瘋因，不大為難友們所知識。其中祇有兩個，因為都是白天被拘進場的，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不知怎麼樣輾轉相傳，這兩個所謂「瘋子」的情形，竟大略地傳佈在全留置場的大部份難友中間。他們究竟怎麼樣知道得那麼清楚呢？我想，一半該是從看守口中得來的吧。

兩名瘋子中，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關進號子裏他一直在哀哀的哭泣，像哀悼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之喪失一般。而於幽怨的悲泣中，他不時聲調迷糊地叫喚着一兩個男子的名字。他這種舉動，一直從進來的下午繼續到出去的次日上午。出去，當然是被送進瘋人院裏。據說，這個老頭本來是頗有福氣的，他有二個兒子。可是二十多歲的大兒子，在五年前的春天，給軍部送到上海去爲天皇「効忠」，以後就沒有回來；五年後，第二兒又是二十多歲，也正好給軍部送到「北支」（註三），不久，一封通知書及一瓶骨灰，作爲他兒子的代價被送回來，前幾天，他的二十歲左右的三兒，又接到出征的通知。這一張小小的薄的「葉書」（註四），便將老頭的意識奪

（註三）華北。

（註四）明信片。

去。然而，要認真地說，它其實是將一個「真性」送給老頭，它使老頭失去了虛偽的忍隱。有人能了解這位老人家苦痛的心情嗎？那是一種人世間最巨大的悲哀啊！

他的哭泣聲是那麼地淒楚，簡直刺得人的心發顫，當他的情形爲人們所知曉後，他的泣聲便在整個留置場中灑上一層濃重的哀愁，人們變得沉默了，我分明看到他的啼聲在同號子的難友的臉龐塗上一層灰色。他們靜默地低下頭，他們的內心正對着人世間的最大的悲哀而發出共鳴呢。

其後不久，也是一個白天的下午，一片不斷的怒罵聲充塞滿整個留置場內，它開首引起難友們的驚異，及至知道那是一個瘋子口中所發出的，這種怒罵聲便只引起難友們一些看馬戲時所常有的嘻笑。然而，等到這個瘋子的來歷用一種無意傳播入留置場中，他那種怒罵，却在人們的心頭，滋長了完全不同的反應。

那是三十多歲的一名茁壯的中年人，他的聲音已使人們理會到他是一個直率粗魯的傢伙。他本來在玻璃工場做工，他用他的工作去養活他的妻和子。然而，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家裏可以換錢的東西都被裝入肚子裏，他嘗試過所有找求工作的方法，都失敗了。而現時，他的妻病

在家中，他的兒子餓在蓆上，他有什麼辦法呢？終於，這種情景使一個純良的直率男人失去駕馭他的理智的能力。

也在第二天的上午，他被送出去，大概是送到瘋人院，至於他的病妻餓子嗎？

以後，還是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於睡夢中給新拘捕進來的瘋子的叫罵哭喊聲驚醒。四週是地獄一樣的漆黑，我的心境變得落寞孤寂到 分！包裹在這種情形內，使我可能於細細體味瘋子的號聲：我從他們的呼聲中，努力去發見他們的蘊著。終於我不因為他們將我從最甜蜜的睡夢中喚回到最醜惡的現實裏，而感到半點憤悻，我了解他們，同情他們，於是我便原諒他們的舉動了。

除了給瘋子的吼叫所驚醒，晚間子夜，我更常常會為一種兇狠的毆罵聲所驚醒，那是看守對新來的犯人的賜與。這種毆打，大都是發生在留置場的甬道上。當然，這種事情，白天也是有的，祇是以夜裏來得多，而且夜裏的毆打要來得更為惡毒。有好幾次，兩三個人圍住一名犯人痛毆的動作，將我從夢中喚醒。那時，聲響的慘悽，會抖動人的心靈，會給我一身冷汗。你能夠想像得到，在一個狹窄得幾於無法轉動身軀的所在，幾個人在兇毆一個可憐的目標，而又不准他閃避叫

喊的那種情景嗎？

十三

這一天，留置場的人們是不容易清楚地知道日序的，大約總是十月下旬吧，死水一般的留置場中，刮進了一陣微風，又引起一點稀渺的漣漪。時間在吃過午餐的「辨當」不久，看守指揮着幾個聽話的犯人在留置場的每一號子內從事一種新的佈置：他們將長長的扶梯拿進每一號子，用長長的黑布圓幕將天花板正中的那盞電燈套上了，唯一的一扇窗也用黑布障上。這樣，整個號子就變得更爲幽暗陰森。

這種佈置究竟爲的什麼？我心裏在這般思索。難道真的怕我國的空軍空襲東京？後來，向難友一打聽，才知道是防空演習。就從當天起，每晚七點鐘左右，尖銳的汽笛聲劃破長空，突破留置場的死寂而傳入人們的耳鼓；同時，隱約聽到外面有呼嘯聲，救火車帶着魔鬼般的銳叫在往來奔馳，於是號子外的電燈熄滅了。有人能夠想像得到有一段時間，號子外是黑暗的世界，而號子

裏却是光明的世界嗎？祇是這個「光明」却是「自由」的威脅呀！

這種演習，繼續了一個星期。我真盼望我國的飛機能夠來，可是這個盼望……於是，我便祇好老樣盤坐在死靜的號子裏，等待着不可知的命運的來臨。有時，無聊得難受，會拔下自己幾根長頭髮，接連成一條長長的細綫，然後再在幾十日沒有洗滌過的腿上手，刮擦下積得厚厚的污垢，圍集成一粒桂圓那麼壯大的黑丸，將長長的髮絲縛在黑丸上，這樣，却成功了一枚頗有特殊風趣的擺子。拿在手中，搖呀搖的，變成一樁頗有味的玩意。難友看到，也生出一點驚訝的表情，他們不明白那顆圓鼓鼓的東西是什麼，更不知道我從那裏弄得它來。及至這個祕密揭曉，他們不禁浮起一些會心的苦笑。此外，我更從一位難友那兒學會了解頭髮打成的小結的方法，又常常抓下長得頗為可觀的頭髮來，打結解結，後來，全號子裏的難友，都學會這套把戲，於是，有時就大家忙着去打頭髮結子。

又是一天的早晨，約莫十點多鐘，我被叫到特高室去。這時，特高室內除了那些穿日本型的西裝的「刑事」，還坐着一個穿和服的二十七八歲的犯人。凡是犯人，都有着使人一望而知的標記，第一，若果他穿和服，則他的束腰的紗帶，必被取去而換上一條非常細小的舊紅布帶，若果

他穿的是工裝或西裝，則他的領帶與褲帶必被取去；第二，他脚上拖的草屨，是留置場中的公用品，自己也在朝夕使用的東西，那會有半點錯認的呢？

青年犯人坐在一張小桌旁，金盛從木櫃裏取出一個小木盒，揭開盒蓋，裏面裝得有油印機所用的一部份的東西，惟每件都要具體而微：有一個小小的油墨捲，一塊潔淨的厚玻璃，一瓶油墨，幾把形狀不同的小刀。金盛用小刀將油墨挑了塗到玻璃板上，然後弄得非常地勻整。過後，我才知道他在印取那青年人的指紋。於是這樣的疑問又浮上我的心頭：這時叫我上來，大概也是爲着印取我的指紋吧？爲什麼要我的指紋呢？根據這點，我作我的推理。我想，假如他們存心將我關在留置場至我最後的一息，那當然無需於我的指紋了。也許我被放的消息已經揭曉，這是他們在送我歸國之前所要留下的痕跡。留下來又做什麼呢？大概怕我將來再到日本來「妨害」他們「帝國」的安全吧。我禁不住暗地裏覺得好笑。將來——我歸國後的將來，除非日本變成另一個國度——

當青年人印蓋完畢後，金盛一面命他坐到小桌旁，在印着指紋的表上填好自己的姓名，籍貫；一面再在印板上調勻油墨，同時指着一瓶火油叫我洗擦我的指頭。這其間，一個滿臉鬍鬚的

「印取這個「支那人」的指紋嗎？」

「是的呀。」金盛回答得帶着一點諂媚的笑，這使我知道問話的人職位一定比金盛高。

「印他的有什麼用呢？」

「有一點用處吧！」

「不，不需要的。」

金盛難爲情地笑一笑，也許是用來表示自己的無識。他再也不說什麼，將印指紋的什物，都收放到小木箱裏，同時叫我停止我的手指的洗擦，叫我到露台的水桶裏用肥皂洗去手上的火油，再叫我坐到小桌旁等待。我乘機偷看那青年人填着的指紋表帶着驚訝，我發現他是臺灣人。他有一個與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名字：李世榮。這個發見，使我的心境變得頗爲沉重。我不知這位李君是馴良的奴隸或反抗暴力的鬥士，總之，他與我是相同遭遇的人，又是那麼隔得並不遼遠的「同胞」呀！

一直坐着等到他寫好，於是我們兩人一道再被送進留置場。兩天過後，李世榮出去了，到什

麼地方去呢？可就不得而知。

留置場中不絕有朝鮮青年的進出，同樣地進出的日本人也以青年佔多數。而於這些青年中，穿着黑嗶嘰大學生制服的又佔有一個極大的比率。這個比率，大概總在三分之一左右吧。他們不絕地進來，也不絕地出去，有時七八名一道被拘進來，大概每天總有兩名吧，他們大都是那所門閥高貴的帝國大學的學生。當然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有，不過爲數較少。他們被拘捕的原因不外兩點，卽是反戰嫌疑或赤色嫌疑，他們都是所謂「思想犯」。在我被傳到特高室裏問話的幾次中，我幾乎每次都可以碰到他們中的一兩個乃至三四個，正伏在小木桌上寫他們的詳細的「手記」，這是每一個「思想犯」被拘進去以後第一件應當做的工作。

在那些帝大生中，有一位與我挺熟習的，他的名字叫做伊佐文雄。爲什麼他和我會熟悉起來呢？這其間也自有原故。

原來留置場內是不許戴眼鏡的，不管眼睛近視到了多少度數的犯人，進來時，眼鏡就連帶着一些其餘的什物爲看守代爲保存。眼鏡爲什麼是一件忌品呢？這就不能不佩服看守們顧慮的週到了。他們大約是怕犯人會利用這兩小片水晶來做出一些「罪上之罪」，於是就杜漸防

徵起來

但也有例外，譬如一些眼睛近視到無法看清楚物體的程度的人，在看守的「恩准」之下，是可能變成留置場中的「特殊階級」。伊佐却就是用他的深度的近視眼鏡引起我深切的注意。

從九月下旬起，每逢留置場鐵門口叫起了一聲「伊佐」，我便可以看得到一位穿黑嗶嘰大學生制服的年青人，通過號門外的甬道出去了。一腦袋蓬鬆的長頭髮罩着一副厚的眼鏡，眼睛的銳利的光芒，通過水晶片射溢出來。其後有兩三次，在特高室內我也碰到過他。老是埋着頭在一張小木桌上寫他的「手記」，他的手記似乎一生一世也寫不完。他禁在第四號的號子裏，在我的號子右壁。

十月初，第四號一名犯人患了劇烈的傳染病，於是同號子的犯人都被隔離出來，分別住到別的號子，伊佐恰好派進我的號子內。相同的年紀與相同的服裝，也許是使人們互相易於接近的原因吧。簡直用不到兩個鐘頭，我和伊佐就變得頗為熟悉了。他是帝國大學哲學系的四年級學生，被捕的原因是反戰的嫌疑。在互相述說自己的遭遇過後，他低聲向我說：

「我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呀！」

我知道他指的是間接的，我應了一聲是，乘着這個機會，我便向他提出我的問題：

「在你們國內，一般人對這次的戰爭不知有什麼反應？」

「唔，那只是軍閥們玩的把戲，智識階級是理智地反對他們，一般大眾則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反對他們這種舉動。因爲軍閥們這樣做，祇會給一般人引來了更大的痛苦。」

「那麼，難道沒有一些人會贊助他們這種舉動嗎？」

「有的，」他低聲地接下去：「那就是資本家們與軍閥們自己。」

大衆而當他自己的命運還是那麼的飄渺的時候，他却用着同情的語調安慰我：

「你不要緊的，放心吧！在東京，沒有充份的證據，他們不敢任意處置一個外國人的。」

稍停，他咬着牙筋悻悻地說：「那批傢伙，對待外國人實在太過野蠻！」

「那麼，你呢？大概快可以出去的吧？」我這麼問，語調中帶有安慰的成份。

「讓他們高興怎麼去處置好了！」

從以後不斷的爲了消除寂寥的低談，我知道他更清楚一點，他懂得很多，範圍是那麼廣泛。

就如在我和他的對談中，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及。曾經談到政治、經濟、哲學、社會科學、文學……等種種色色的問題。他對中國的古代文學，頗有一點認識。說來慚愧，他所能夠背誦得出的王維、李白、杜甫的詩，要比我多。他說，從高中起，他就開始對中國文學的學習。他能夠很了解地看中文，可是他不能說也不能寫。

那是一個熱情面有趣的人，他憧憬於人類的進步，所以他愛下一代的小孩甚於一切。當然，他對阻礙人類進步的障礙物——野蠻的侵略的軍閥們的憤怒，是無法忍受的。他不甘於對惡勢力的屈服，所以他頗憂慮於自己是否有很快地被釋出去的可能。雖然他實在沒有參加過什麼實際的行動。

他被拘禁快到兩個月了。原來他的住處就是上野那所被認為激進思想發源地的帝大宿舍。起初，他爲上野區的警察署所拘留，在那邊的留置場中度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光，然後才被轉解到帝國大學所在地的本鄉區本富士警察署來歸案。由是，我便明瞭他所以一進留置場頭髮就那麼長得怕人。

「我要計劃作我的畢業論文，時候快到了，我不知能否來得及。」他常常憂鬱地這麼說。

「不要緊的，你大概很快就可以被釋放出去的。」每當他聽到我這句照例的安慰，他總是以默然的搖頭來回答。

十月底的一天，他被叫出去了，回來，他喜悅地告訴我們，他第二天就可以出去，是帝大二位教授保他出去的。

第二天上午，他懇懇地向我辭別，像離別他的一位老朋友。

十四

黑嗶嘰制服的帝大生的身影，固然給留置場塗上了一些異彩。然而，比較帝大生，能夠給留置場塗上更濃郁的異彩——乃至可以說增上一些溫馨的，却是女犯人。

本白在第一號的號子左邊，是一間沒有號數的小監房，那就是專用拘禁女犯的。這間小監房的第一个特點，固然在它沒有號數；此外，它還有兩三個其他的與別的拘禁男犯的號子不同的地方，例如第一，它最接近留置場的出入口；第二，它的對面就是看守住的房間；第三，它的鐵柵門的

面積等於全長闊橫闊的面積。(拘禁男犯的號子，鐵柵門底寬度只等於號子的橫闊面積三分之一)大概關於第二點，是自有其頗為明顯的原因：在長期拘禁的經驗，使我知道凡拘禁在十天以上的男犯，對異性會感到特別的興趣，假如拘禁女犯的號子對任何一間拘禁男犯的號子，真是門當戶對，男號子的犯人一定會隨時乘着看守不注意從鐵柵門的柵欄向對方窺探。爲了避免這點，於是女號子就祇好設在看守宿舍的對方，當然，看守們向女犯人大加青睞，那是例外。因了這第一點也有其必然性了。蓋看守的宿舍，照例是不能不臨於留置場的出入口，隨之而女犯的號子也不能不臨於留置場的出入口。至於第三點，除了爲着給看守們能夠一覽無遺外，我想不到有其他的因素。

進留置場來的女犯，其總數雖不比男犯多，但似乎也不少呢。他們不絕地進來，也不絕地出去。她們大多數拘禁的時候不怎麼長久，很少拘禁有在一星期以上的。其中有十八九歲的一下女，模樣的人，有剪髮西裝的摩登女郎，有六七十歲的老太婆，有梳着捲髮高髻，臉塗厚厚白粉，爲了用着過份的香料而竟至將全留置場薰得香噴噴的妓女。至於她們被捕的原因，那我可不得而知了。她們進來之後，大部份似乎完全沒有悲苦的表現，有些甚且整天嘻嘻哈哈地與同號

子的或與看守們說說笑笑。本來男犯人高聲談話是在被嚴斥之例的，可是女犯人得到看守的特別「恩准」當然可以放肆了。這兒有着一個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們中的大部份，不知道自己不會久被禁錮，心裏的恐怖與悲傷，當然就不大存在。至於她們的進來，似乎對於男犯也不無少利。每當她們通過甬道到盥洗室裏去的時候，每個號子裏的男犯都像看什麼難得的而又久待的東西般，紛紛偷偷地從鐵門欄柵的空隙向外張望，於是跟着就有一陣看守的叱喝聲。但看守們自己，却時時盡情地向女犯說着種種帶調笑意味的話。有些女犯們，竟也會毫不知羞恥地對看守高聲說出一些帶媚惑意味的語句來。這樣，也總算在死寂的留置場中，搗起一些漣漪。

其實，要說我全不知道她們被捕的原因，似乎有點過份。因為至少，在我的地獄生涯的兩個多月中，在不絕進出的幾十個女犯內，有三個被捕的原由是直接或間接地為我所知曉。

那是我進留置場兩星期之後，約莫在九月十幾左右，女號子關禁進一位女犯人。就女囚犯說，她被禁錮的時間頂長久，直到十月底才出去。也就因為時間的長久，於是漸漸地，她為每個難友所習熟了。是那麼可憐的一個女孩子呀！年紀只有十七歲，名字叫做金素貞，這不是一個很像

中國人的名字嗎？是的，她也是我們的久被劫奪了的隣居，她是一位朝鮮人，面貌頗爲清秀，剪髮，然而却穿一身花花綠綠的和服，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日本話。她到過北平，到過上海，最近才來到東京。她被捕的原因，是形跡可疑。

這裏，我得來一個說明，爲什麼我對她會知道得這麼清楚？原來拘禁時間的長久，使她已深切引起全留置場難友的關注。對她，難友們於有意無意中互相探詢或由一些平素與看守感情略好的難友向看守時作打聽，得到一點點即使非常平凡的消息，我們會一忽兒用種種巧妙的方法散播在全留置場內。而且於長久的拘禁期中，看守逢着閑得無聊，往往會倚在女號子的鐵柵門外向金素貞問左問右，金素貞也常會用天真的孩子般的低聲來回答一些可能回答的問題。她的身世，就以這樣的方法注入難友的心裏。

她常常被叫出去問話，我有兩次在特高室裏碰到她，我不禁感到驚異了。我心裏浮起了這樣的疑問來：「她也是思想犯嗎？也是政治犯嗎？」唉，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鷹犬們，是絕不會顧惜於對一個殖民地的女孩子的戕害的，他們竟會懷疑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是間諜，是爲了自己祖國的自由而鬥爭的革命家，是有力危害「日本帝國」的人。尤其是在我國發動了抗戰

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鷹犬們，就用最大的努力，企圖肅清那種「亂黨」。於是這位十六七歲的可憐的女孩子，就與成千成萬在東京的朝鮮人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單在本鄉區這個留置場裏，被禁錮着的朝鮮青年爲數亦在不少呢。

金素貞常常被叫出去問話，她的臉孔一日日地黃瘦下去，到後來，簡直黃瘦得叫人看了有點心酸。在號子中，她常常會高聲號哭，夾着哭聲叫爸爸媽媽，看守的叱罵沒有辦法停止。這種還不懂人情世故的女孩子，底悲痛的哀號，這種哀號，將我們也帶到悲傷的氣氛裏。

她直到十月底才離開留置場，據一位難友告訴我，她是被押解回朝鮮去了。

第二個我知道她被捕的原因的女犯，是一位二十三歲剪髮和服的女人，她是日本人，愛上一位汽車夫，偕逃了，在旅館裏被警察認爲形跡可疑而雙雙拘獲。那個汽車夫，就關在我的號子內，因之，這一段「羅曼斯」，就變成號子裏難友們解悶的談話資料。那位汽車夫，真有點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每當他的愛人通過甬道到盥洗室去的時候，他總得貪婪地站到鐵門欄柵旁，想要向她說些什麼。這樣，他遭受到看守幾次聲色俱厲的叱喝。兩天後，他和他的愛人雙雙被釋出，我真不禁暗地裏爲這對有情人的前途祝福。

第三個我知道她被捕的原因的女犯，才是一個使我永遠無法忘記的人，她不單十足是我的同胞，而且又是我的同鄉——一位廣東的女性！

十月初旬一個下午，隨着留置場的鐵門沉重地響過之後，一位新的女犯被送了進來。照例，新犯人進來時，得受看守關於姓名年齡籍貫的問話，而問話的處所，則正是位於甬道的中部，在我的號子門外的左方，所以問話的時候，我的號子裏可以聽得非常清楚。這一天，那位女犯回答看守的問話，雖然是在用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日本話，可是我總覺得她的聲調有點異樣。由於我是坐在號子最內面靠牆的角落裏，又由於她的聲調過於低弱，我不能好好地全部聽清楚她對看守的答覆。可是同號子那兩個坐近門旁角落的難友，却終於偷偷地側着頭靠近門縫靜聽了她的回答以後，果然就在地板上用指頭寫給我看，說那位新來的女犯是「支那娘」。唉，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帝都」中，每個同胞所有的命運就是被橫加逮捕！

我開始對她注意了，是一個身材矮小的女學生模樣的人。每當通過甬道到盥洗室去的當兒，她總是盡可能地把頭俯低。當她進來的第一個晚上，地獄中死一般的靜寂使我能夠聽得到女號子裏發出來的低微的哭泣，我下意識地知道哭泣的就是她。這種悲楚的泣聲，像一根利箭

射入我的心底，我的眼淚也幾乎被引得掉下了。

過了兩天，我被特高室的傢伙叫到樓上去照相——這是每一個被捕的人所須例行的。當我已經照好，跟着被帶上去的就是那位女同胞。那時她也是爲了照相而被帶進特高室。她被指示着坐好了，於是與我適才所嘗味過的一樣，一張寫着她底姓名年齡的白紙，就被用小針貫在她胸前的衣服上，紙面寫着「易××當二十五年」等字。這樣，我便知道她的姓名與年齡。可是我還不知道她被捕的直接原因。那時，她也許不會知道站在她旁邊不遠的一個與她遭遇了同樣命運的「男犯」正是她的同胞呢。我乘着那些鷹犬們不注意，我清清楚楚看到她全部面龐的輪廓：兩眼有點紅腫，面色黃得有點怕人。唉，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以怎樣「文明」的手段待對我們的留學生！

這之後，我常常於晚間會隱約地聽到從女號子裏傳來了她那淒楚的微弱的低泣聲。有時，我會憤然地這麼想：哭什麼呢？我們不能這麼懦弱的呀！可是，一回顧自身所嘗味到的痛楚，我原諒她了，我對她生出了最大的同情。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於這時處在這種景况中，真不知要悲苦到什麼程度呢！

着高熱，人有點昏昏迷迷的。看守將我的病狀向特高室的傢伙們報告，於是我被叫到樓上去，剛巧那時易××正在室中而室中那幾個東西又正在忙於自己的工作，易××於是受了金盛的指示，代替他來問我的病情。金盛向她說明我是中國人，於是她就用着南方人說的北平話問我。久已沒有聽到的可愛的祖國的語言，使我與無限親切之感。雖然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從不認識的同胞，可是同樣遭受到敵人的迫害，在同病相憐的情況下，我恍如於危難的臨死的刹那，遇見了久別故人。

末後她偷偷地乘金盛那傢伙不注意，低聲問我是那一省的。我說是廣東，她帶着驚訝的表情說自己也是廣東人。她接着問我是什麼時候被捕進來的，當我正要回答，而我們這種交談已使聽不懂中國話的金盛也多少猜得到我們已說到病狀以外的事情了。於是他鼓圓眼睛，兇惡地向易××喝住，而且還用力地在她的黃蠟般的臉孔上捏了一把。這一捏正像一隻狠毒的蟹螯般挾在我的心裏上，我的肢體爲了憤怒而微微一抖。記住，我們的同胞是在受異國的倭奴這般的凌辱！

她低下頭去，眼角立刻泛上一點晶亮的結晶體。我們的談話祇好無可奈何地停止了下來，我頗想清楚地知道她被捕的原因與經過，可是我終於沒有辦法知道。那時，那裏有講話的自由呢？

照我的推想，她一定也是一個無辜地被加上了「容疑者」的罪名而遭拘捕的。原來「八一三」以後，東京的警察，就立刻開始大規模地拘捕我國的留學生，用盡了最鄙劣、無恥、野蠻、殘酷的手段。她一定也與我一樣，是這種手段之下的無辜的受難者。雖然自己正身處地獄中，可是我每時不禁爲她未來的前途生出了無限的憂慮。

在十一月初頭，易××有兩三次被叫出留置場去，經過一個長久的時間。因爲這兩三次臨出去時，她都跑到甬道盡頭擺着的木櫃裏拿她的鞋子，用這點我證明她是被領到警察署外去的。因爲囚犯於留置場乃至全警察署中行動時，都照例穿着留置場特備的木屐，祇有被釋放出去，才再行穿起一進留置場就放進木櫃裏去的自己的鞋履。兩每當易××被指示着穿上自己的鞋子出留置場，於是靜靜地盤坐在另一號子的角落裏的她的同胞——我就會衷心地生出一種禱祝。我幾度以爲她一定是被釋放出去了，我爲他未來的前途祝福。可是一連兩三次，她於

中午出去直到傍晚時份又被關進來，這使我有點莫名其妙，留置場中是向無這樣的先例。我不禁暗自問自己，那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天是十一月四日，在上午十一時左右，我又被金盛從留置場叫到特高室。與我一道從留置場被叫上去的，又是易××。到了特高室，立即金盛又與易××出去了，我被留着枯坐在特高室內。

這時，特高室內除了辦事人員外，還坐了五位穿帝國大學的黑嗶嘰制服的青年。他們也是留置場中的囚徒，被關進來已有三四天。他們每人都俯伏在木桌上，寫他們的「手記」。這些青年也都是「思想犯」呀。從他們的外表，可以看出一個誠摯的青年的靈魂。可是，正因為他們具有自己的靈魂，於是他們就得變成囚犯。

比較我，他們要略為自由一點，他們可以在監視中會見他們的親屬，更可以接受親屬送來的衣裳食品。就在這時，我看到一位慈祥和藹的母親，攜來了一些水果糕餅等物，在特高室內會見她的失去自由的兒子。具有一般老年婦人的溫和的母親，看到她的受苦的孩子，眼淚忍不住流出眼眶。她叫着兒子坐到自己的身傍，她低聲用着勸解慰藉的聲調，向着自己的兒子勸說。兒

子默默無言，已經是大學生了，當然他不會缺乏正確的智慧。終於，母親留下了攜來的物品，帶着悲戚的面容，離開她的可愛的兒子出去。

我一直就坐在靠近臨着馬路的鐵框玻璃窗左面的角落裏，呆呆的，不被審問，也沒有要作的事情。然而，枯坐在那個角落裏，我也不感到寥寂；那裏有一線的陽光，通過窗的厚玻璃刺射進來，塗在我的身上。即使是通過厚厚的玻璃的一線微弱的陽光，但對於一個久不見天日的囚徒，它是多麼的可貴呀！它不僅帶來給我以熱，而且它更帶來給我以光明的象徵。還有一點使我感到欣快的：通過厚玻璃，美麗的街景映入我的眼簾，發射着晶亮的閃光的汽車，一輛輛地駛過去；擠得滿滿的電車，衝過去時發出鋼鐵的沉重碰撞聲與「運轉手」(註一)踏着腳鐘發出來的清脆的叮噠聲；來往的人的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着花花綠綠的和服，拿着各色各樣的物品，他們是那麼的自由與輕快！他們可會想像得到，就在這座樓上，正有着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端的陷害而失去自由的人，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內的嗎？

當五、六個帝大生停止了他們寫「手記」的工作直後，他們開始享受親屬們送來的食品：

其中有鮮紅圓大的「林檎」(註二)有種種色色的日本「菓子」得到特高室那些傢伙的同意，他們分了一部份拿着送到我的跟前的桌子上，以青年人的熱情的聲調，低低地叫我不要客氣。那時，偉大的超乎國界的青年人的同情，比較美味的食品，對一個老吃冷「辨當」的人的引誘，更加巨重地激動我的心弦。他們知道我是中國人，當然也知道我正是担着和他們一樣的罪名：思想犯或政治犯。他們好意的施與，除了表現着純潔的患難中人類的同情之外，也許還包涵一點「同道」者的熱情呢。這，使我的心激動得發顫，連帶引起了手的微抖。本來別人的施與是一種對我的侮辱，然而這一次，溫暖的青年人的同情融化了我這點見解，終於我在激動中喫了一些。

我經驗到日本的智識份子有不少是我們的友人，當日日本軍閥們被消滅後，中日這兩個民族的大衆，有一天是會真正地攜起手來的。

兩點鐘左右，特高室一個滿臉鬍鬚的「刑事」招呼那五六名帝大生下樓小解。這一招呼，使我誤會到其中包含有我。於是，我也跟着站起來。可是在我的腳剛跨出特高室的門口，一隻穿

着皮鞋的脚飛起來，沉重地踢在我的胸部，使我幾乎仰倒下去。滿臉鬍鬚的傢伙，兇暴的網着紅絲的眼睛，睜得骨碌碌地，口裏罵着「馬鹿」，還要舉起第二次的獸腿來呢。我祇好退回去，依舊不聲不響地坐在原來的那把小破圓櫈上。可是，我的心，又加上了最難忘的恥辱的一刺！

過了不久，金盛和易××回來了，她手中還提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包袱，而且還換上一身較爲整齊的西裝。

金盛向千田那矮個子主任唧噥了一會，接過來兩三張紙片，於是再帶了易××出去。通過厚玻璃片，我看到他們同坐上一部野雞汽車，於是我推想得到易××也許是被送回祖國去。以前，看到留置場的難友被釋放，心裏會交流着羨慕與難堪——爲自己的絕望而生的難堪，可是這一次，充滿我內心的是快感與祝福。少一位青年同胞被禁在日本的牢獄中，我國就增加一分原氣。

十五

其中有一篇是關於「林彪」(其二)的，這是一篇關於日本「軍干」的，這是一篇關於高室聖些對內閣

留置場的氣氛變得有點冰冷，而號子內的氣氛變得更為冰冷。在這一段時期中，雖也間或有二新囚參加到我的號子內，可是他們往往勾留不久就被放出去。到後來，有時號子裏就只剩下我和會社員池山這對老搭檔。

他進來的時候比我還要長久，他是八月中被拘進的，起初關在第二號過了一段時日，然後再轉關到我的號子裏來。他與我相處在同一號子中的時候也算最為長遠，然而，壞的傢伙給人的印象絕不會因為時間的長久而減去壞的成份，相反的，它祇有隨着時間的久遠而變得更加明顯與濃厚，池山之於我就是這樣。終結，我證明他是一個在不良的社會羣中沾染上滿身壞習慣的缺乏同情心的傢伙。所以每當他向我招呼一聲，然後在水門汀的牆壁上寫着「你永遠不能出去」給我看的時候，我就立刻將眼光收轉來，一聲不響，一整天我順眼也不望他一眼。

常常兩三天，我不和他作一句的交談。當號子內祇剩有我和他，永亘的沉寂便統治了整個號子。有時，我幾乎懷疑自己說話的機能是否健全，兩三天不發聲也是一樁令人難過的事。說話原也是人類的本能呀，不能夠適當地使用或滿足自己本能的慾求，那該是多末的不幸！可是，人們每逢處身無法可想的境地，他必會努力於各方面發掘出種種滿足自己慾求的方法，這大概

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吧。卽如我，在這種死寂的整天不出一聲的境況內，爲了滿足我發聲的潛能的慾求，於是我就發明了以誦經的姿勢來背誦古文的方法……可是在不許站起來，非盤坐得規規矩矩，就有遭到叱罵的可能的境況中，我再也沒有本領發見滿足我的腿脛的活動本能的方法了。長期的盤坐，我的腿變得麻木。這一麻木，不同於通常一般人於坐得稍久時所感到的麻痺。我的腿的麻木，是潛在的，是慢性的。當盤坐着的時候，不大覺得它的顯露。可是，站起來一跑動，就會覺得腿的膝部鎖骨的變動有點不大靈活。而且每當我用手觸到我的腿時，我幾乎要大吃一驚，吃驚的程度又一次比一次利害。原來我腿部的肌肉，已失去一般肌肉被撫觸時所應有的感覺了。它變得毫無感覺，它是一些失去機能的肌肉呀。我懼怕地想，這樣下去，我的腿會有失去跑路的能力的一天。

我似乎已經變得毫無所望了，最後一次的所謂明白的審問不是已過去差不多一個月了嗎？什麼消息却像小石塊沉落在大洋中，一天比一天沉落得更爲深遠了。我完全絕望，我無力判斷自己這時的腦神經是否已經跨上了失常的道路，我有時甚且會對自己的想像與動作覺得有點不可理解。這樣下去，我一定發瘋的，我自己作着這樣的預言。

在明知無望的情景中，我簡直不再希望自己的生活會滲進一些些的變動。然而，人世間往往有無限多的事情是在你全不希望全不想像的時間中來臨的。

是十一月七日吧，早上十一時左右，我又給金盛叫上樓去。我懷疑，我不明白這是爲的什麼，於是我的心情中又交流着一些懷疑與希望。

到了特高室，我被指着坐在靠近窗邊的小圓檯上，這樣直繼續到下午一點鐘。一點鐘以後，特高室的職員們開始像下班一般離去了，最後祇剩着金盛在室內，原來這天是星期日，下半年休假，可是這次大概輪到金盛值班，於是別人跑光，他仍得留着。這時，特高室裏就祇有我和那個傢伙。到這時，我才知道他叫我上來的原因，是爲了在特高室內作一些細碎的服役，如拾字紙呀，拿火柴呀……我是帶着最大的憤怒的心緒，用無可奈何的忍耐去做着它們的。失去了全部自由的人，是多麼可憐的動物！內心的痛楚，使我幾乎窒息住呼吸。然而，這時我能有什麼辦法呢？

特高室內間斷地走進兩名警察來，是爲了交遞公文或交代事情。他們進來，又匆匆忙忙地出去。於是無言的沉靜，接着統治了室內的整個空間。

忽地，玻璃框門被推開了，走進來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穿西裝的中年人，他與金盛用日本話

的短短的交談，告訴我他也是一位我的同胞，是一家中華料理店的老闆，他每月似乎照例得將自己的居留證拿來繳驗一次。這日的來臨，大約就是爲了這點。往常繳驗的手續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祇是這一次大概有點特別吧，我這麼想。

在交談過後，我聽到金盛像審問人犯一般用惡狠狠的語調問：『那麼，你爲什麼不趕快回國去？』

我在長久的異族的壓迫下已變得有些畏怯的那位料理店的老闆，用平板的音調這麼回答：『我在東京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覺得在東京住得很好。』

『現時不是兩國正在開仗嗎？』

『是的，不過……這和我們在外國做生意的不甚關連呀。』從一種極爲勉强的面部的表情中，我發現到在生活的威脅下不能不說着不願意說的語句的人，是怎樣在受着良心的苛責。

『將來全支那都要變成「滿洲國」一樣的。』帶着冷笑，金盛的話銳利地刺痛着我的心。

『唔唔……』我聽到這位同胞無可奈何地這樣答着。

『那麼，你覺得「滿洲國」怎麼樣？』

『我自小的時候就讀過一些書，雖然人盡皆知，但……』

「對這方面我一向並不怎麼留意，所以不大清楚。」

「不知道呀！」金盛那傢伙眼睛突得圓鼓鼓，像一匹瘋狗就要發瘋時的神情。

「那你對「支那」的認識又怎麼樣呢？」那匹瘋狗接住這麼問，有着更加兇狠的表情。

「唔……那……沒有什麼。」

「怎麼說沒有什麼你不愛你的祖國？」一步步迫進了，金盛的口氣一句兇惡似一句。最後，他伸手順勢在桌旁拿起了一根粗木棒，一面在說話，一面揮動着木棒。而這時，我心裏却陸地浮起了一個突然的思考。

我坐在玻璃窗旁的小圓椅上，靠南，金盛坐在北面一張大寫字檯的正中，那位開料理店的同胞則斜坐在大寫字檯的對面，他們正在那邊一問一答地鬧得頗爲起勁，金盛手裏緊捏住的木棒有幾次像要打到那位受爾審的同胞的頭上。於是突然一個思想，飄過我的腦中：我看見另一張桌上有一根長長的粗粗的串紙片用的鐵錐，我估計這根錐子假使從人的頭上刺進去，它準可置人於死地。這正是一個機會呀，特高室內除了金盛外，就只有那位不知有什麼命運將要降臨到自己的身上的同胞和我。我想，假如我能夠用最敏捷的動作將金盛刺倒了，那位同胞一

定會和我合作的，我們可以一道逃出去，即或不能，那也是值得的呀。我自己既然已經是一個沒有生還希望的死囚，那麼，以我的沒有價值的生命來換取金盛的，一來是復了仇，二則可以除去一隻以陷害別人爲職志的爪牙，雖然我也知道新的會立刻補上他的缺子。總之，這時在我的腦海中出現的最大的問題，却是我有沒有可靠的把握將他置諸死地。

他們的爭論憂然的中止，將我的思潮截斷了。最後，我聽到金盛一聲像是叱罵的話：『出去吧，算你好運。』

（註一）飯館

十六

當我再度踏進留置場，我就照例地跑到右側的第五號的號子門外，我通過鐵柵欄，朝裏面一望，訝異不禁掩上我的心頭。本來還拘禁着兩位難友的號子，這時裏面已空無所有。難道他們都被釋放了？又或難道他們都被叫出去問話了？

這時，跟在我後面的中川看守，從桌上拿起那一大串鑰匙來開號子門了。可是奇怪，他並不

開第五號的，而只將鑰匙插進第五號對過的第二號的鐵柵門的鎖孔。第二號的門被拉開，中川揮着手叫我進去。這時，我唯一的辦法當然只有服從，於是在四雙眼睛射出來的帶着好奇的目光底迎接之下，我開始踏進了一個陌生的但也可以算是熟習的環境。

號子裏已然坐着四個人：一位方臉型留着仁丹鬍子穿和服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佔住鐵門右面的角落；它的左角落，則填塞着一位二十二三歲的肥頭胖臉的青年人；裏首的右角落，坐着的是一位二十左右的瘦個子；左角落，則是一個十六七歲的胖少年，這幾副臉面都會爲我於放出去大小便時所或多或少地看過幾次的，可是我對它們底主人的一切，却全不熟悉。這時，我祇好在右面的牆壁介乎中年人與瘦個子的當中坐下。那四副面孔所顯現的表情，可以看出對我並不含有特殊的憎惡與仇視，使我不期然地感到一陣較爲溫暖的氣息。

他們都知道我是中國人，因爲這點是整個留置場所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在我盤坐好的當兒，那位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便立刻以低低的聲調和我交談起來。首先，他向我介紹同號子的幾位難友並他自己；他的名字叫武內正吉，是一位藝人（註一）曾經隨着自己的班子到過北平及青

（註一）此處是指演日本喜劇的戲子。

島上演被捕的原因是酒醉鬥毆；坐在他對過的那位肥頭胖臉的青年，叫河原健，是洗衣店傭員，因爲入不敷出虧空了店裏一筆小款，於是就被請來一嘗鐵窗風味；十六七歲的胖少年，叫山浦一郎，是一家小藥房裏的學徒，爲了偷竊被捕；瘦個子青年人，叫竹內芳雄，也是一家小商店的店員，被捕的原因，恰與河原相同。

很快地，我和他們變得頗爲熟悉了。從武內的遞說，我知道我所以會遷押到第二號內的原因。原來這時，五六兩間號子裏每間所押的囚犯，只有兩名，而其他一、二、三、四等四號中，每號則四五人不等。看守們爲了省却每天多開幾次五六兩間號子的鐵門，於是將那兩號裏的囚人，都合併到別的號子裏去。我被分配到第二號，與我在第五號同住了一個多月的池山，則被分配到第一號。這麼樣，於是從一至四每間闕不上一方丈的號子，至少也擠上五個人。其後，新的犯人進來了，看守就不顧死活，像壓緊着軟性的東西到一個小木箱中，祇是將他們往已經擠得滿滿的號子裏塞，而讓其餘的兩間空號子一直空着。就在我的第二號，其後最多的一個晚上，竟然擠到八名。那時，人們就只好直直地挺着，一動也無法動得。我常常於夜半醒來時，感覺到一半的肢體被壓擠得變成麻木了。此外，七八個人的碳酸氣，使這麼小的監房內的空氣由污濁變爲發臭。靠裏

牆原是有一面交叉着粗鐵枝的廣不盈尺的小窗，可是夜間就被從外面遮蓋上。其實，這樣也好一點，不然，像利刃一般的冷風，刺上蓋着破舊的爛棉被的軀體，真要比針刺還難過，它會使人整晚無法合得上眼皮。並不是囚徒們甘於污臭的空氣，可是這樣兩相比較，每闔號子的窗門，才由全體犯人的要求而於每晚被從外面遮蓋起。

號子的更換，向我的死寂的心情似乎加了一些些活氣。比較上說來，這間號子較之第五號要略微多了一點人類的溫暖。在這樣的境遇中，人類的些微的溫情，也變成最可寶貴的東西了。

那位「藝人」武內，是一位滑稽而有趣的人，真不愧「藝人」本色，他會弄種種把戲，會跳日本的土風舞，會唱歌，會做鬼臉，會說笑話……他是大家一個解悶的材料。他對我頗為尊敬，這「尊敬」的發生也許有點奇怪。他說我是一個有學問的人，這點不知他從那裏觀察出來。於是他常常說我是一個有頭腦的人，因為有「頭腦」，所以未來就有無限的希望。他自己呢？他說自己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所以永遠只好靠自己的技藝來換一頓飯吃。可是他也極會欺負別人，他罵河原做笨猪，有好幾次他迎頭照臉將河原打了好些巴掌，對方不敢還手。後來，我知道河原也是服過兵役的。我奇怪這一名過去的「皇軍」，爲什麼這麼的軟弱蠢笨。此外，胖少年

山浦與瘦個子竹內，都還是兩個帶點天真無邪的少年。於是無形中，武內便成了號子裏的霸王。他還有八天便可出去；他向我說，不久他會跟着他的戲班子到北平上演去呢。他說，他覺得中國好，我知道他是以北平與青島作爲整個中國的模特兒。後來他這樣問我：

「你什麼時候可以放出去呀？」

「大概不久了吧。」我想了一想，祇好這樣回答。我究竟什麼時候會被放出去呢，那真是天曉得。

「喂，你回國之後，一定要作親日的工作呀！作親日的一份子呀！」語調裏含有誠摯的成份。我才知道沒有「頭腦」的人很容易不自覺地將別人也當作沒有「頭腦」的。

我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只得「唔」了兩三聲，算是給他滿意的回答吧。

吃過晚餐的「辦當」，我通過鐵門的柵欄，得到了一個快慰的消息。原來第二號號子的鐵柵門，恰巧斜對住看守們的「辦公」桌，乘着看守不注意，難友們可以偷偷地站起來將眼光穿過鐵門柵柱的空隙，射落在掛鐘的表面上，在牆間掛的那塊記着犯人名數的黑木牌上，在間壁的日曆上，在電燈的亮光上……

七點多鐘，我盤坐着，看到一名看守在拿着「夕刊」(註二)朝着燈光細讀，他的背斜照着號子的鐵門，我估計得到，假如我站起來將眼光射過看守的左臂旁，我定然可以看見報紙上的黑字；我那時盤坐得正近於鐵門的右角落。

與外界的一切毫無所接觸，這樣經過了兩個月，我的心是多麼地不寧靜呀！尤其是當祖國正在負起了保衛正義與和平的使命爲了自己的生存而邁開大步向前躍進的當兒，被禁錮在敵人的地獄中的我的心靈，實無時不飛迴於燃燒着神聖的解放火炬的祖國的戰場上。雖然野蠻的暴力將我羈制地囚鎖在幽暗的地獄中，但我得想辦法，放開一些空隙，給我活躍的心飛馳出去。

我用着最輕的移動，慢慢地將軀體挺立起來，同時，我的眼光就以最高的速度刺過柵柱的空隙，緊抓住報紙上的黑點。於是一個大字的標題，立即反映在我的意識上了：「南翔附近，展開爭奪戰。」

距離使我沒有辦法看得清楚其它的較小的黑點，而心情的激動，就使我慢慢地再行以輕

的移動盤坐下去。我的心便立即飛到一個美麗的地方去了。

南翔——一個多麼值得懷戀憶念的地方呀！它說得上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曾經有幾年的時光，就消磨在它的懷抱內。那一帶秀麗靜穆的景色與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回憶，一直就以最鮮明的身影，永亘地留在我的腦海中。

美麗的平靜的我的第二故鄉，這時該已經籠罩在敵人兇橫殘毒的砲火內了。記得「一二八」之役，那兒就曾經踐踏過寇兵的獸蹄。因為它的地位的衝要，我推想它這一次是絕難倖免的。於是，這個柔美的故鄉之遭劫，陷我的心情於極度的悲憤。然而更刺痛我底心靈的，是對於我的一些純樸真摯的鄉中友人的憂念。

三年長長的生活以及因為辦民衆學校所生起的密切的接觸，使那一帶的鄉村中許多鄉民變爲我的好友了。他們中有男的，女的，有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也有十多歲的小孩子。當然，二三十歲的壯年伙子是更多。他們給與我以最純潔天真的友情，他們看我是他們的兄弟。就是這些天真的友情，使我居住在冷落的鄉間感到了無限的溫暖。他們是世代生息於這塊和平的土地上，他們的祖宗給他們留下了幾片田莊或幾間瓦屋，他們要將這些再留給他們的兒孫。可是，如

今呢我知道敵人的野蠻的砲火會毀滅他們相依爲命的一切，我更憂慮在敵人殘酷的砲火下，他們的生命會不會遭受到什麼危險。於是一幅扶老攜幼於初冬的夜寒中沿着大路小路追求他們未來的不可知的命運的流亡圖，便立刻躍現在我的眼簾。什麼人使他們這樣呢？而未來又是怎樣的命運等待在他們的面前呢？——我的同胞，我的友人們呀！

可是，其時一種快慰與歡欣也捲上我的心頭。數字加疊上數字，我計算了一下：「八一三」到這時，八十八天是踱了過去。從蘆溝橋事件擴大之後在報紙上我就常常看到了日本瘋狂的軍閥所謂三個月結束事變的狂言。然而事實證明了這句狂言的滑稽。差不多九十多天了，自詡爲世界第一的敵人的軍隊，在華中推進了還不到五十里。僅僅「南翔附近展開爭奪戰」這幾個字，它們在我的眼中實包含得有敵人巨大的損失與我方將士英勇作戰的畫圖。

興奮、悲痛、仇恨、激怒……幾乎使我一整晚張開着眼睛度過了。

十七

第二天——八日，上午十一點鐘左右，我又被叫出留置場，碰不可知的命運去了。我踏進特高室，厭惡憎恨與驚訝的意識的波浪，便立刻泛上我的心頭。警視廳派來審問我的那個胖傢伙與瘦個子，這時也在特高室內他們正在和室內的人們談天。我的來臨中斷了他們的談話，他們瞟過來一瞥輕蔑的眼光，接着，高個子向倭胖子這麼說：「我們開始工作吧！」

倭胖子點一點頭，沒有移動他的肢體。

高個子再也不說什麼了，默然地領我出去，一同到第二調室，靠着長方桌坐定，他揭開膨脹的公事皮包，拿出了一疊警視廳的稿紙，再拿出了一個月前我所「招供」的我的「自傳」。他沒有說什麼，攤開了空白的紙，與寫有黑字的紙，在桌上，然後他將我的「自傳」底主要內容譯成了日文，寫在稿紙上，讓我默默地坐着看他寫。間或有些他覺得字眼不明之處，就用中國話問我幾句。這個工作繼續約莫兩個鐘頭，完成了。他將他寫好的日文摘要指給我看，問我那上面所寫的是否都為我的自供，我點了一點頭。我在懷疑：他們究竟要根據這份「自供」來怎樣處置我呢？

「我們已經調查終結了，你沒有罪。」他慢慢地這麼說。

我「唔」了一聲，算作回答。

「假如你願意的話，你仍然可以住在東京。你還是願意回國去。」

「住在東京」這真是一句多麼「香甜」的語句呀！可惜我再也沒有勇氣來消受這個「文明」國家的待遇了。我想，住在東京是可以的，那得要日本變成另一種制度的國家。那，你這個笨傢伙又何必這麼虛偽地說上這一句呢？

「我願意回國去。」我簡單地這麼回答了。

「好的，那麼一個禮拜之後，我們「護送」你回國去。」

說了這句話，他出去將倭胖子叫了進來，我覺得這一次倭胖子的臉色似乎比較好看一點。他叫我在那份日文的摘要的「自供」上簽了名。然後拿一個紅色的印色膏盒子將我的姆指沾上紅油印一個指紋在我的簽名下面。我想，這一篇總算是我底真正供詞了吧。

完畢了這種手續，我於是再被帶進留置場。在我的心中，回來時却比出去時增加了一點東西。它就是「希望」。

一切都是新鮮的，活躍的，光輝的，生動的，我幾乎將留置場幻化成一所宮殿。兩月餘我喪失

了全部的自由，我直面对着死神。當生的火炬與自由的閃光在前面隱約向我伸手，我的欣快差一點沒有使我瘋狂。

到號子內，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武內他們，他們也爲我的幸運而快慰。於是，武內再一次重複他幾天前所曾說過的那一句：

「喂，你回國之後，一定要作親日的工作呀！作親日的一份子呀！」
我的答應仍然是「唔唔」，可是，禁不住一種海一樣深的憎恨與仇讎爬上我的心葉，冷笑着，在我的心裏迂迴。我知道，將來我定會辜負這位忠於他的「天皇陛下」的藝者。

瘋狂的日本侵略者，不單在兩國的民衆中間築上高厚的隔膜的泥牆，而且更將仇恨的種子播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心田上。在野獸們正肆其蹄爪於和平的大地的當兒，却又於他方面它伸出了蒙着人皮的手，要來親善，這豈不是一個最愚蠢的狡猾嗎？

整個晚上，我又爲興奮的思潮佔去了睡眠。回想到過去，那是多麼像夢境呀！幻想着未來，我會在自由的空氣下嗅到祖國土地的溫馨的氣息，會接觸到好些親切的友人，更可以追隨着整個國族的邁步而前進。一星期，一星期之後呀！

在興奮的期待中，我盤坐着，期待着。

這時，山浦已經出獄了，號子裏的難友，除了原有的三名外，又添進來兩名，其一是帝國大學經濟學系的三年級生大倉敏彥，瘦長身材，有着一雙光燦燦的眼睛，高鼻梁，薄嘴唇，是一副蘊藏着精幹的容貌。不大好說話，但說出來的語句都充滿了熱情與力量。他具有進步的思想，所以他得以「思想犯」的姿態被禁錮起來。兩天的接觸，使我對他有着更多的認識。他是一位正義的鬥士，他直接參加了反戰的行動。他知道得很多，他對中國的民族解放的抗戰表示極大的同情，他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閥們的敵人呀。

第二個是二十七八歲的瘦個子，穿着破舊的西裝，頭髮似乎有三四個月沒有接觸過理髮匠的剪刀，戴着度數極深的近視眼鏡；在某些方面他像一個斯文人，可是在某些方面他又有一點小癩三的風度。顯然的，蓋在他身上的衣服，沒有能力去抵禦暗濕的留置場中的陰寒，於是一進來他就微微的發抖，盤坐下去他仍然繼續着微抖。當難友們爲好奇推動而向他問訊時，他靦腆地說出自己的行狀。原來他是在赤門（註一）對過一家小書店裏偷了兩本書，被發見了，於是

就被請進來吃現成「辨當」他的名字是佐佐木慶一。

「偷來的書，是以來閱讀嗎？」河原問，眼裏閃着奇怪的光流。

「佐佐木沒有用言語來回答，代以搖頭。」

「是爲了賣錢呀。」大倉低聲地回答河原。

「有什麼辦法呢？我失業已經有五個月了！」佐佐木以沙啞的低音，無可奈何地這麼說出。說這句話之先，也許有一種本能的羞愧使他侷促，可是這句低沙的語句，却在全號子的難友的面影上塗抹一層哀愁與同情的色彩。

晚間，在他脫除去上衣與長褲，要將肢體籠進烏黑的破棉絮去的當兒，一種難以分辨其種屬的綜合型的惡臭，立刻給號子的污腐的空氣加上一層濃郁的新質素。難友們雖爲了這而更加皺緊眉梢，可是人們會從心底裏來原諒他的。你能夠苛責一個幾月來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人不洗滌他的軀體及更換他的衣服嗎？

五天之後，我被傳上特高室去接受一個消息：第二天，我要被領出去，到下宿館中收拾行李；第三天上，我得被送到橫濱坐上開往香港的輪船。

十八

兩個多月沒有看見陽光，兩個多月祇看到四塔發射出死灰色的水門汀牆壁，我得補充一點，其中有一面牆壁的中下部配上一扇裝了柵欄的小鐵門，時時從柵欄的空隙出現一副兇狠的面孔，呼喝叱罵。

嘗我忽然踏到馬路上，深秋的陽光竟刺得我簡直沒法將眼睛自然地張大。而高大的水門汀建築物，於我簡直像一座山。這些山，又恍惚會微微地旋動。頭好像有點暈眩，我的感覺官不能習熟於四週的環境了。——金盛利貞這時將我領出了警察署的大門，他要帶我再回到鹿鳴館去，爲了收拾我的衣物。

帝國大學赤門前那條寬闊馬路的兩傍，出現了一個奇景。這條馬路我跑得爛熟，我記得直到兩個多月前我踏進地獄的那一天止，它的兩傍祇是行人路與店舖，但這時都添種上一丈來高的法國梧桐，飄了滿地黃葉，使我悠然想起烽火連天的祖國底深秋來。於是一種莫名的惆悵

的悲痛，捲上我的心頭，我幾乎掉下了眼淚。

鹿鳴館最多不過半里路，我的腿已因兩個多月不習於跑動而有點發酸了。這時，我還穿了高底的木屐。

兩個多月沒有見到的「御婆樣」(註一)，仍是那麼樣會微笑；兩個多月沒有見到的三個有點熟習的下女，仍是那麼馴服得像一副機器。她們依舊是那麼樣刻板地生活着，但我的心頭却感到有點冷淒淒。金盛那傢伙，咕哩咕嚕地向她們說明了我的來意，我深深感到了一種莫名的不快；我竟無法在她們呆板而麻木的表情上看出她們對我的被送回國有什麼情感上的反應。

我熟練地跑到自己住過的房中，用最大的速度將一些用得到的衣服放到皮箱裏。金盛在警察署的特高室中，早已帶着威脅的意味說我被他們搜去的四十多塊錢，還不敷使用。他計算着給我看，單祇船費就要四十元，而我還欠「下宿館」十多塊錢房租呢，於是他硬主張將我的全部書籍與不大需用的東西拍賣。這時，他早已叫了兩個收買舊貨的人來了。我心裏想，生命都

(註一)指房東太太。

幾乎給那些狗的血口無辜地吞噬了，東西的損失我是無所計較的。就一任金盛與那兩個舊貨商人隨意合夥地定一些價錢。一套原價十一元祇穿了五六個月的嗶嘰大學生服，祇賣了五角錢；新買要一百多塊錢的東西，其中包含有大批中文、英文、世界語、日文的書籍及字典，一張新的棉被，一隻藤箱，一具提琴，一雙套鞋，一隻照相機的三腳架……祇換來了整整的十元，剛夠付欠下的房租。而我的一些衣服及必需品合起來還裝不滿一隻皮箱呢。

皮箱捆束妥當，仍然放在鹿鳴館，於是我又一次被帶進本富士警察署去。到了特高室，金盛才向我說，船費祇要三十二元。我感到有點滑稽，我三分之二的東西便在這種滑稽的狡計下以十元的代價送給舊貨商了。

我再被送入留置場，這是最後一夜了。過去種種，像連環圖畫般一幅又一幅地閃過我的腦裏。我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又不自覺地搖起頭來。同號子的五位難友，知道我明天就可以生活在自由的空氣底下，都爲我感到欣喜。大倉默然地用手指在地板上劃起來：

「祝你有一個愉快的航海並望回國以後爲正義努力！」

「謝謝。」我也用手指在地板上寫：「願你能早一點出去。」

「唉！」他嘆了一口氣，憂愁地搖起頭來。

這一個晚上並不怎麼好過，我簡直沒有好好地合過眼。一個失去自由的人對自由的祈待底焦急，是難以想像的。我簡直高興得近於發狂。我想，我的出獄，不單是從不自由到自由，而且是從死路跑上了生路，我是早以為自己不會活着出去的。

第二天，吃過第一次的「辨當」之後，我的焦急便一分一秒地增加。通過臨着甬道的鐵門底鐵柵欄，我不時偷偷地看掛在對壁的小鐘。我每看一次，焦急便增加一倍，真像有一團火在我身體內慢慢地燃燒起來。金盛昨天說過，今早九點便領我出獄，先到鹿鳴館取那隻皮箱，然後僱汽車到橫濱，船是下午三時「出帆」的。可是九時過了，九時半又過了，我變得不知如何是好。像有什麼東西嚼着我體內的什麼部份，慢慢地，我微微顫抖起來。難道又發生了什麼變故嗎？難道我終非死在東京的地獄中不可嗎？我茫然，神經真像有點失常。大倉君看出了我的焦急，極力在安慰我，他說，時候還早呢。

西人「恐怕船的「出帆」時間改變了。」我無可奈何地說。

英平「不會的；從東京到橫濱，用汽車五十分鐘就夠了，時候還來得及呢。」他低聲地就近我的

耳邊說。

『金盛昨天明明說九點便可領我出去，還要取行李呢。』

『放心吧，他們會算好的。』他關切地說。

十點了，號子的鐵門響了，是囚徒到廁所的時候。我雜在同號子幾個難友中，順排地跑到到甬道的盡頭去。

當我小便過後，剛踏出廁所的門口，甬道對方盡頭的鐵門外，響起了一個熟稔的聲音：『張！』

那扇鐵門中部的一扇小窗開了，我看見金盛在和看守低聲地交談，我明白他們談的是什麼。

兩月來的地獄生涯，使我長了不少獄中經驗，我知道囚徒們臨釋放的時候應當做些什麼。普通囚犯臨出獄時，都得在一本簿子上捺一個指印，只有政治嫌疑犯不用。我真何幸，硬被戴上政治犯的帽子，這時便樂得少捺一個指模了。

我低聲而又暗暗地與同號子的難友打一下招呼，聲音低到也許只有我自己聽得到，我說

了一聲「沙約那拉」(註二)，跟着看守向甬道出口的鐵門走去。

鐵門外除了金盛，還有一個二十七歲穿西裝的，他是特高室新雇用的職員，要隨着金盛實習這種「護送」工作。

我被左右「衛護」着，擠到「鹿鳴館」去，我吃力地提了皮箱出來，他們是前後追隨着。臨到我要踏出「鹿鳴館」的門口，房東太太拿了一包水菓遞給我，作爲送行的禮物，而且還附有她親筆寫就的一封信。坐到汽車裏，我才空出兩隻手來拆開它，寫得真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

汽車經過的途中，不時可以看到了大輛的卡車，滿載了「皇軍」，踏上侵略中國的旅程。每次，金盛立刻將呢帽拿着，伸出車窗外，高聲怪叫着「勝利勝利！」我心裏充滿着憤激，想到這些明亮的鎗管發射出來的子彈，會有不少是鑽進我國婦孺的身上，恍惚我眼前是一羣青面獠牙的怪獸。

車到橫濱，停在水上警察署的門口，我提了皮箱，跟他們一道進去。又有兩個人來參加護送了，是水警署的人員。其中一個的相貌，好生面熟，使我不能不努力回憶。啊，恍然了！年前我坐船從

大連到橫濱，登陸時就是他向我問話的。以前是他「迎」着我踏上扶桑三島，如今又是他「送」我出虎口去，我微妙地感到一點滑稽。

坐了水上警察署的小電船，我被四個人「保衛」着送到舊茂丸——一隻屬於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的航行南洋澳洲方面的小郵船，七千五百噸。

皮箱放在甲板上，我被領進了頭等的 Salon，從地獄踏進天堂了：厚厚的地毯，華麗的桌布，軟綿綿的沙發，而四周更有配合得非常柔和的花花草草。

橫濱水上警察署派來的那兩個，辦自己的公事去了；從東京與我一道來的那兩個，始終不離開我半步。我們坐到餐桌旁的旋椅上，白衣侍者盛了三杯牛奶和一些點心來。你們不要看不起幾件點心，吃了兩個多月冷硬無味的「辦當」之後，我第一次嘗到有生以來最美味的食品。快到三點了，忙着辦自己公事的那兩個傢伙出現了，一共仍然是四個人，又領了我出去。到甲板上，我被指點着再拿起自己的皮箱，再跟着他們走。這時，前面多了一個領引的白衣侍役。

「到那裏去呢？」問題出現在我的心頭。

向船尾的方向跑去，上了一道扶梯，似乎是船尾最高的一層。然而，一待轉到兩所房間的後

面，我又發見一道扶梯。我揀着大皮箱，跟着他們踏上了去。

那是船尾部最高的船頂了，兩傍靠近船邊沿，用繩索吊掛着幾艘救生艇，中部那就什麼都沒有，零零亂亂地散放了許多破舊的東西，有破木板，有成堆的馬鈴薯，有成捆的像是茶葉的東西，又有一些爛的救生圈。而於這雜亂破舊的東西底堆層中，我發見了用木板將就地蓋成的小屋。待役用鑰匙將木屋的門開了，我乘這個時機，用眼向四週探索一下，發見了在門的上楣，釘着一條小得近於沒有的木片，打橫地寫了「病房」兩個小字，已經給雨水淋得有點看不清楚了。

我被他們「護送」了進去，門被關上，而且聽到了在外面加鎖的聲音。你可曾知道在郵船中也有剝奪別人全部的監房嗎？那就是「大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的「茂丸船尾頂上那所病房。於是，我又開始嘗一種特殊的鐵窗風味，我變成太平洋上一所病房中的「囚徒」。

四壁粉作灰白色，一方丈寬的房間靠木牆裝了兩張小鐵床，其上面鋪了破舊不堪的臥褥，還有一張便只是光光的幾條鐵枝，真像一所孤立在沙漠中的小屋。然而，我却得在裏面用去我生命史上一部份時光——

—— 十一天。

忽地，我欣然於自己能在沙漠中發見了奇跡。原來朝船頭那一方，有一個配上厚玻璃的

圓洞。我趕快靠近了它，呵！一口氣將玻璃擦亮，將眼睛挪近去。

船在慢慢地移動了，碼頭上集滿送行的人，紅紅綠綠的紙條，將船上人的手與岸上人的手連在一起，隨着深秋的海風，儘是飄飄捲捲。帶着別離情調的音樂，開始激盪着離人的心懷。對這些，我像毫無所感。

我祇是睜大了貪婪的眼睛，要看一個飽。我像從一個絕無人跡的孤島回到了人間，一切都似乎充滿了無窮的滋味。我不願意片刻離開那塊玻璃，我看到紙條爲船與岸的分離而拉斷了。穿紅衣的少女也許是送情人遠行，隨着船慢慢的移行而跑了不少的路，直跑到碼頭盡處的燈塔下。

別矣，日本帝國！再來時，我願看到你是一副新的面目！

